

全球对话

GLOBAL DIALOGUE

9.2

一年出版3期，以17种语言刊出

访谈Nandini Sundar

Johanna Grubner

转型与替代

Matt Dawson
Rainer Rilling
Mateo Martínez Abarca
Abdelkader Latreche
Teresa Perez
Christopher Mabeza

纪念

Erik Olin Wright

Michael Burawoy
Michelle Williams

性別和社會不平等

Birgit Riegraf
Lina Abirafeh
Kadri Aavik
Liisa Husu
Blanka Nyklová
Margaret Abraham
Nicola Piper
Jeff Hearn

非洲(南非)社会学

Jeremy Seekings
Mokong S. Mapadimeng
Asanda Benya
Thabang Sefalafala
Marc C.A. Wegerif
Jabusile Madyazvimbishi Shumba
Alexia Webster
Edward Webster

开放论坛

> 從團結的觀點看右派民粹主義

MAGAZINE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isa

第9卷 / 第2期 / 2019.8
<http://globaldialogue.isa-sociology.org/>

GD



> 主编的话

社会学家除了推动该学科内部的蓬勃发展，而且还参与公共讨论。在过去十年中，印度最著名的社会学家和社会运动家 Nandini Sundar 通过参与政治，去挑战了学术和运动之间的界限，并在第一线面对印度的不公不义。在本期“全球对话”的访谈里面，Sundar 谈到了印度“Bastar 战争”的过去和现在，以及在成为成为一名优秀的学者和运动者的困难。

我们的讨论从“转型与替代”的两篇文章开始，通过社会学的历史追溯和反思社会学对另类替代社会和可能的未来，讨论为什么这种反思对于将社会学批判与解放思想的融合是必要的。一篇拉丁美洲的文章强调了为巩固社会的政治斗争，以及像 Buen Vivir 这样的概念如何有效。Qatar 的文章比较了阿拉伯世界的多种未来可能性。来自南非和津巴布韦的文章分析了行动者如何应对人们生活中的重大变化（由气候变迁引起的变化）以及政策变化可能面临的阻碍。

Erik Olin Wright 一生致力于追求平等，自由，社群，于 2019 年 1 月去世。我们失去了一位社会学家。他在的马克思主义，和“实存的乌托邦”不仅鼓舞了全球的学者，还带领了大家去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和民主的社会而奋斗。他的两位亲密朋友向他的生涯和工作致上了敬意。

在我们的第二个讨论串中，Birgit Riegraf, Lina Abirafeh 和 Kadri Aavik 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介绍他们对“性别与社会不

平等”的研究。这些文章触及不同的面向，如欧洲研究经费分配中的性别不平等，捷克性别研究的现状处境，阿拉伯地区性别不平等的现状，以及亚洲脉络下的性别化劳动。这些文章让我们深入了解社会进步或性别平等的议题，并引发关于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要如何为平等和社会正义提供实际解决方案的讨论。这些文章也指出了社会行动的必要性，还有继续性别平等奋斗，进一步为实现平等社会的必要。

区域讨论的部份则关注“非洲（南非）社会学”，第一篇文章着重在南非持续存在的贫穷和不平等，以此对整个非洲的提出对全非洲的警讯。第二篇文章讨论了南非教会的日益普及和争议，并处理了社会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沉默响应。接下来的两篇文章对南非矿工的处境进行了讨论，其中一篇显示了包容性论述如何与实际上排斥女性从事某些任务是互相矛盾的。第二篇文章则对黑人失业矿工进行了人类学考察，研究失业的影响到自信和自我价值。我们可以从关于坦尚尼亚劳工的文章认识达 Dar es Salaam 的粮食系统。下一篇文章奠基津巴布韦的历史上讨论改变和维持津巴布韦掠夺型国家的积累和政治再生产的模式。凭借精彩的图文集，亚 Alexia 和 Edward Webster 将关于约翰内斯堡历史叙事，和关于建造在黄金上的城市的精彩照片，相互结合，。

本期最后的文章分析奥地利和匈牙利的欧洲右翼民粹主义。

全球對話以 17 種語言刊出，請至 [ISA website](https://isa-web.org/)。

投稿請寄給 globaldialogue.isa@gmail.com。

isa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GLOBAL
DIALOGUE**



> 编辑团队

主编: Brigitte Aulenbacher, Klaus Dörre.

助理主编: Johanna Grubner, Christine Schickert.

副主编: Aparna Sundar.

执行主编: Lola Busuttil, August Bagà.

顾问: Michael Burawoy.

编辑顾问: Juan Lejarraga.

编辑顾问:

Sari Hanafi, Geoffrey Pleyers, Filomin Gutierrez, Eloísa Martín, Sawako Shirahase, Izabela Barlinska, Tova Benski, Chih-Jou Jay Chen, Jan Fritz, Koichi Hasegawa, Hiroshi Ishida, Grace Khunou, Allison Loconto, Susan McDaniel, Elina Oinas, Laura Oso Casas, Bandana Purkayastha, Rhoda Reddock, Mounir Saidani, Ayse Saktanber, Celi Scalón, Nazanin Shahrokni.

区域编辑

阿拉伯: Sari Hanafi, Souraya Mouloudji Garrouddji, Fatima Radhouani, Mounir Saidani.

阿根廷: Alejandra Otamendi, Juan Ignacio Piovani, Pilar Pi Puig, Martín Urtasun.

孟加拉: Habibur Haque Khondker, Hasan Mahmud, Juwel Rana, US Rokeya Akhter, Toufika Sultana, Asif Bin Ali, Khairun Nahar, Kazi Fadia Esha, Helal Uddin, Muhaimin Chowdhury, Md. Eunus Ali.

巴西: Gustavo Taniguti, Andreza Galli, Lucas Amaral Oliveira, Benno Warken, Angelo Martins Junior, Dmitri Cerboncini Fernandes.

法国/西班牙: Lola Busuttil.

印度: Rashmi Jain, Nidhi Bansal, Pragya Sharma, Manish Yadav, Sandeep Meel.

印度尼西亚 Kamanto Sunarto, Hari Nugroho, Lucia Ratih Kusumadewi, Fina Itriati, Indera Ratna Irawati Pattinasarany, Benedictus Hari Juliawan, Mohamad Shohibuddin, Dominggus Elcid Li, Antonius Ario Seto Hardjana, Diana Teresa Pakasi, Nurul Aini, Geger Riyanto, Aditya Pradana Setiadi.

伊朗: Reyhaneh Javadi, Niayesh Dolati, Abbas Shahrabi, Sayyed Muhamad Mutallebi, Vahid Lenjanzade.

日本: Satomi Yamamoto, Yuko Masui, Riho Tanaka, Marie Yamamoto, Shogo Ariyoshi, Kazuma Kawasaki, Sae Kodama, Koki Koyanagi, Tatsuhiro Ohata, Shunji Sugihara, Ryo Wakamatsu.

哈萨克: Aigul Zabirowa, Bayan Smagambet, Adil Rodionov, Almash Tlespayeva, Kuanysh Tel, Almagul Mussina, Aknur Imankul.

波兰: Jakub Barszczewski, Iwona Bojadziejewa, Katarzyna Dębska, Anna Dulny-Leszczynska, Krzysztof Gubański, Monika Helak, Sara Herczyńska, Justyna Kościńska, Agata Kukla, Adam Müller, Weronika Peek, Zofia Penza-Gabler, Jonathan Scovil, Agnieszka Szypulska, Aleksandra Wagner, Mateusz Wojda.

罗马尼亚: Cosima Rughiniș, Raisa-Gabriela Zamfirescu, Luciana Anăstăsoaie, Cristian Chira, Diana Alexandra Dumitrescu, Radu Dumitrescu, Iulian Gabor, Dan Gitman, Alecsandra Irimie-Ana, Cristiana Lotrea, Ioana Mălureanu, Bianca Mihăilă, Andreea Elena Moldoveanu, Oana-Elena Negrea, Mioara Paraschiv, Codruț Pinzaru, Susana Maria Popa, Adriana Sohodoleanu, Maria Stoicescu, Cătălin Varzari.

俄国: Elena Zdravomyslova, Anastasia Daur, Valentina Isaeva.

台湾: 何經懋

土耳其: Gül Çorbacıoğlu, Irmak Evren.



关于当前社会组织的变革和替代的思考一直是社会学思想的一部分，对社会变革和变革的研究亦是。来自全球各地的文章为这些问题提供了理论和经验。



全球上的女性仍然占穷人和边缘化群体的多数。本期文章讨论了不同领域的性别和不平等，包括研究经费，新自由主义，国家，劳动。



本期深入探讨了南非的理论观点和实证研究，还包括津巴布韦和坦尚尼亚，还有整个非洲的问题，最后还有关于约翰内斯堡历图文解析。



Global Dialogue 由SAGE出版

> 本期內容

主編的話	2
------	---

> 談論社會學

燃燒樹林：訪談Nandini Sundar Johanna Grubner, 奧地利	5
---	---

> 轉型與替代

社會學替代世界的簡史 Matt Dawson, 英國	8
形成中的未來 Rainer Rilling, 德國	10
Buen Vivir的多重聲音 Mateo Martínez Abarca, 墨西哥	12
阿拉伯世界的另外的未來 Abdelkader Latreche, 卡達/阿爾吉利亞	14
污名如何限制了政策： 南非拾荒者的例子 Teresa Perez, 南非	16
適應氣候變遷：津巴布韋小農的例子 Christopher Mabeza, 津巴布韋	18

> 紀念Erik Olin Wright

Erik Olin Wright：實存烏托邦 Michael Burawoy, 美國	20
紀念Erik Olin Wright Michelle Williams, 南非	22

> 性別和社會不平等

把性別和不平等連結起來：導論 Birgit Riegraf, 德國, Lina Abirafeh, 黎巴嫩, Kadri Aavik, 芬蘭	23
研究經費的性別挑戰	25

Liisa Husu, 芬蘭/瑞典	27
捷克的性別不平等 Blanka Nyklová, 捷克	29
持續與改變：美國的性別不平等 Margaret Abraham, 美國	31
阿拉伯的性別和不平等 Lina Abirafeh, 黎巴嫩	33
亞洲脈絡下的性別化勞動與不平等 Nicola Piper, 英國	35
IPSP：性別觀點的社會進步 Jeff Hearn, 芬蘭/瑞典/英國	

> 非洲(南非)社會學

貧窮和不平等：南非作為非洲的警訊 Jeremy Seekings, 南非	37
南非的五旬節運動和基督教 Mokong S. Mapadimeng, 南非	41
空間入侵者：地底女性礦工 Asanda Benya, 南非	43
失業的嚴重經濟影響 Thabang Sefalafala, 南非	45
怎麼餵養世界：坦尚尼亞的啟示 Marc C.A. Wegerif, 南非	48
津巴布韋的掠奪型國家：政黨、軍隊、商業 Jabusile Madyazvimbishi Shumba, 津巴布韋	50
Jozzi：黃金的危險城市 Alexia Webster, Edward Webster, 南非	

> 開放論壇

從團結的觀點看右派民粹主義 Jörg Flecker, Carina Altreiter, István Grajczár, Saskja Schindler, 奧地利	55
--	----

“危機時期最困難的事情就是要記住我們有責任繼續做研究。有時社會學研究似乎是個人的，除了作者之外，與其他人無益，有時甚至覺得沒意義，特別是非開創性的研究，但是，最終我們還是為世界增進了對社會的理解。”

Nandini Sundar

> 燃烧树林：

访谈Nandini Sundar

Nandini Sundar 是 Delhi 大学经济学院的社会系教授，她最近的著作包括了：《The Burning Forest: India's War in Bastar》(Juggernaut Press, 2016, 新版标题是 The Burning Forest: India's War Against the Maoists), Verso, 2019) v; 编辑的书：《The Scheduled Tribes and Their India》(OUP, 2016); 《Civil Wars in South Asia: State, Sovereignty, Development》(与 Aparna Sundar 合编, SAGE, 2014); 《Inequality and Social Mobility in Post-Reform India》，是 Contemporary South Asia 的部份 (与 Ravinder Kaur 合编, 2016)。她也合写了：《Subalterns and Sovereigns: An Anthropological History of Bastar》(二版, 2007); 合写。《Branching Out: Joint Forest Management in India》(2001); 编有《Legal Grounds: Natural Resources, Identity and the Law in Jharkhand》(2009); 合编的《Anthropology in the East: The founders of Indian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2007)。Sundar 是《Contributions to Indian Sociology》从 2007 到 2011 的主编，也是许多期刊和政府部份的审查委员。她获得了 Infosys 的社会科学奖 (社会人类学)，2016 年研究发展 Ester Boserup 奖，和 Malcolm Adiseshiah 2017 年的杰出研究奖。

Sundar 自 2005 年以来一直从事人权的诉讼和运动。2011 年印度最高法院在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决“Nandini Sundar 与 Chhattisgarh 州”中，禁止了国家对武装警戒活动的支持。她经常就当代问题为媒体撰稿，其文章可在 <http://nandinisundar.blogspot.com> 上看到。

本文是 Johanna Grubner 的采访，他是奥地利 Johannes Kepler 大学的博士研究员，也是《全球对话》的助理编辑。



Nandini Sundar.

JG：你的广受好评的书《被压迫者和主权：Bastar 的人类学史》于 1997 年出版，主要关注 Bastar 的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历史。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一开始兴趣和动机，去研究印度中部的这个地区？

NS：我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在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开始攻读博士学位时，我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如 E. P. Thompson, Eric Hobsbawm, 以及像 June Nash 和 William Roseberry 等人类学家，聚焦政治经济学。在印度，学者们正在讨论被压迫者的历史。我知道我想研究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和农民反叛的当代社会运动，但需要一段时间来爬梳梗概脉络。1990 年我第一次访问了 Bastar，其拥有了博士论文所需的所有

>>

素材：慷慨的人民，持續的社會運動，叛逆的過去，最重要的是，沒有人真正研究過這段歷史！

JG：在你的最新著作《燃烧的森林：印度对抗毛派之战》中，你讨论你在 Bastar 地区继续研究和实地考察的结果。能否简要介绍一下今天在这一地区所发生的社会和政治冲突？

NS：上个世纪的印度中部的森林和矿产资源开始被开发利用，这一过程在 21 世纪初愈演愈烈。大企业获得了采矿合约，取代了在地小区，导致了环境和社会危机。人们则在透过运动去抵制流离失所。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这个形式是通过参与印度共产党（毛派）的武装游击活动，反政府的反叛乱行动涉及大量的非法杀人，还有大规模的安全营地扩散和及地区的军事化。目前，政府和毛派尽管都声称希望为了人民的利益而进行对话，但是都对采取武装斗争路线，互不妥协。

JG：在《燃烧的森林》中，你对印度的民主有所质疑，并指出“印度是一个拥有所有制度的民主国家，但他们的实质意义并不被期待。”你能否说明一下？

NS：通常那些被认为对民主至关重要的元素，像是选举或福利，通常被用来使替代的抗议模式以及不符合国家失业率增加的生活方式。这些包括与森林共存的形式以及一系列制造业。即使在“正常时期”，代议士也有问题，因为结构性不平等，例如选举所需的大量经费，使各方阵营依赖大企业，导致腐败贪污。然而，在反叛乱或冲突期间，民主制度作为压迫工具而非代表民意的使用尤其如此。例如，人们被迫投票以使政治秩序合法化，并且选择性地禁止政党和结社。目前在印度大部分媒体已经被右翼把持，并且正在成为仇恨宣传者，伪装成民族主义者。越来越多的民主的制度被架空，例如司法，监察等。民主政治，权力分立和民意因此需要创造性替代方案去突破限制。

JG：Bastar 的社会和政治冲突涉及国家以及其不同的结构，不同政治和社会目标，以及的不同政治和社会团体。您能谈谈您所使用的理论框架，以及您应用的经验和方法来研究这些差异以，及您认为它们之所以有用的原因吗？

NS：我的基本理论框架是马克思主义。然而，在《燃烧的森林》中，我试图通过考察媒体，司法和政党等不同制度的响应方式来实现民主人类学民族志。我们看到共同建构的选择性处罚和不平等，以及人们的生存和战斗的意志。我试图吸引普遍的读者群，所以批评比较隐晦。方法的选择主要取决于具体情况。作为反

对侵犯人权的诉讼当事人，我在某些场域是难以进入的，例如警察和。但是，其他空间可用于其他研究，例如提起公益诉讼所涉及的法律程序以及司法机构的运作方式。

JG：根据您的经验，您在 Bastar 进行的社会学研究能帮助我们更广泛地了解冲突的社会结构吗？如果是的话，你能否告诉我们你在 Bastar 脉络下观察社会冲突时发现的一些关键？

NS：Bastar 正在发生的事情和其他地方正在发生的事情之间存在许多相似之处，特别是在与原住民地区。我从拉丁美洲运动和国家暴力的文献以及反叛乱研究中学到了很多，包括英国在马来西亚，越南等地的个案。

有很多方法可以切入这一个主题，我可以想到至少有三本书可以写：关于警戒性和权威问题，国家代理人和个人罪责，法律及其构成国家的方式，或者内战的冲突和情绪。此外，与研究拉丁美洲武装左翼的社会学和人类学文献不同，我们对毛主义动没有好的研究，例如，看看它们在土地分配和当地农业政治经济方面带来的变化。我认为这是值得做的研究。

JG：在民主原则受到挑战，并且基本人权受到侵犯的情况下，您认为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的责任是什么？

NS：我们作为公民，社会学家，教师，都有多重责任。有时我们会被要求戴上我们的公民帽子去参加示威，签署请愿书，在法庭上提供证据。在其他时候，我们对学生和同事的责任是则因为学术生活的而被排除。危机时期最困难的事情就是要记住我们有责任继续做研究。有时社会学研究似乎是个人的，除了作者之外，与其他人无益，有时甚至觉得没意义，特别是非开创性的研究，但是，最终我们还是为世界增进了对社会的理解。在学术不平等的这些日子里，重要的是不断提醒：社会学研究是一种特权。

JG：你被认为是学术界和社运者。你同意吗？您如何描述印度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典型关系，以及这对您的研究有何影响？

NS：我一直参与各种公民自由运动，但这是因为作为一名研究员在 Bastar 上投入了大量经费，于是我在 2005 年几乎全职参与了人权运动。2007 年我们开始对最高法院针对警惕和国家暴行提起的诉讼，但我没想到，我们仍然在 2019 年出庭。2011 年，我们做出了很大的判决，禁止国家支持治安维持者，并向所有受害者提出赔偿，但政府拒绝，所以我们仍在努力争取。2016 年，Chhattisgarh 邦警方对我

们六人提出谋杀，携带武器，骚乱等提起报复起诉，并根据印度主要反恐法律之一的“非法活动预防法”提出指控。幸运的是，我们得到了法院的缓刑，并没有被判入狱，但指控要到2019年2月才解除。

随着时间的过去，我在Chhattisgarh邦的行动已经减少，因为其他人已经开始研究这个问题。就个人而言，我觉得很难同时成为一名优秀的运动分子和一名优秀的学者，除非是时间允许，否则不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许多印度社会科学家都参与某种形式的运动，因为我们周围的问题是如此紧迫。但也有其他人对行动主义不支持，声称它有损于客观性和适当的理论化。在莫迪政府下，将大学保留为学术空间本身就成了一项挑战，因为研讨会已被禁止，演讲被取消，学生被指控煽动殴打和殴打，书籍，包括我的书，因为“反国家”而被禁止。

JG：由于你的研究已经引起了很大的关注，所以很多人会对你对未来的动向感到好奇。你能否告诉我们你的计划？

NS：在某种程度上它取决于印度的政治前途，以及未来政府如何对待大学。我有几个研究项目，包括研究印度宪法，以及学生运动对国家政治的影响，但我不确定他们最终会关心什么。我也想在另一个大陆做研究，但不确定是否以及何时可能。其中很多事情还取决于可以请假，但在这些日子里这肯定越来越难以实现。■

來信寄給 Nandini Sundar
<nandinisundar@yahoo.com>

> 社会学替代世界 界的简史

Matt Dawson, University of Glasgow, 英国



思考组织社会的替代方案一直是社会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照片：C. Duncan / Flickr。

8

“那么，还有什么选择呢？”我不可能是唯一一个被问到这个问题的人。

这问题是问社会学有哪些对于世界的另类想象。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的全部，但这激发我写出关于另类社会的社会理论，我试图概述社会学家提供的一系列替代方案。我学到了丰富的社会学历史。正如其他人所指出的那样，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这毫无异问是必须面对的问题：替代想象。对于今天应对这种困境，爬梳这些替代方案的历史将非常有用。

关于这段历史，我看到的是批判与替代的紧密联结。马克思曾讽刺说他不会“为未来的烹饪工作室撰写食谱”，而是要使用了共产主义的概念，亦即铲除私有财产制度，减少劳动分工，工作成因此成为为我们“最重要的所需”。对于后来的马克思主义作家来说也是如

此，无论是 Henri Lefebvre 使用自动化（组织管理）的替代方式来阐明日常生活被控制的方式，Herbert Marcuse 也强调了人类所建议的“新的主体性”。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伟大拒斥”运动或 Angela Davis 倡导废除监狱作为对有害的监狱工业同盟的响应。这些马克思主义者站在一起，认为替代世界的想法是有用的，也是必要的。

从其他角度来看，来自不同传统的社会学家在对批判与替代的紧密关系也抱持了这种观点。涂尔干提供了多种选择，包括禁止继承。继承被认为与现代的法国精神违背，其重点是个人主义和任人唯贤。继承也加剧了经济不平等，因此应予以禁止。在苏格兰的 Patrick Geddes 试图通过“保守手术”克服工业化城市的过度拥挤和不健康，该系统重新设计了以城

>>

市空间为重点的城市。爱丁堡的老城区仍然体现了他的想法，也就是Patrick Geddes Heritage Trail。同时，在美国，W.E.B Du Bois用不同的选择回应了种族不平等制度。他从倡导“黑人学院”所表达的乐观，自由的学术教育，转向了对黑人经济隔离的激进主张，以展示超越资本主义的可能性。

C. Wright Mills 在社会学想象一书中声称社会学使社会更加民主，所以我们会看到关注加强民主的替代世界方案也就不足为奇。在芝加哥，George Herbert Mead 强调了所有人的“天赋”在一个民主中彰显的困难，这种民主将政治会被贬为为“个性”之争，所以提倡一系列社会改革，社会定居，城市俱乐部，移民保护，罢工仲裁，民权运动，特殊教育，去确保所有公民都有机会以民主方式表达自己。同时，流亡在伦敦的Karl Mannheim概述了一套“激进民主”制度，其中包括一套严格执行的中央民主价值观和一个社会学教育的“新统治阶级”，以避免法西斯主义的兴起。

女性主义社会学也为寻求替代世界有着重大贡献。Selma James 和 Mariarosa Dalla Costa 响应以前的作家像是 Margaret Benson，其主张将家务劳动是工作，将家务劳动的工资看成克服父权制不公平的手段，并希望通过这一点使女性成为社会主义社会革命斗争的核心主体。后来，为了响应人们对色情作品“性化等级”的担忧，并将女性观念转化为男性主要的满足感，Andrea Dworkin 和 Catherine MacKinnon 试图禁止色情。作为响应，Lynne Segal 和 Sheila McGregor 等女性主义者认为，我们不应该禁止色情，而应该倡导女性主义的性。

这些替代方案，以及其他如Giddens的“第三条道路”，Beck 倡导的“公民的欧洲”，为基本收入辩论等做出贡献，倡导社会学的公共介入。虽然Michael Burawoy对“公共社会学”

的提倡鼓励社会学家反思公共活动的本质，但这担心已经从公共社会学的历史例子中被消解了。然而，当我们通过社会学家如何提供替代方案的角度来看待这段历史时，我们发现了当今丰富的例子，从Geddes的城市重新规划，Mead的小区主义，Davis的反监狱运动，到Mannheim的无线电课程。这样的焦点也让我们想起小说传达社会学选择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也许最重要的是Charlotte Perkins Gilman的女性主义乌托邦“Herland”，其强调集体育儿和人与自然之间的永续性。

Ruth Levitas 建议说，因为我们花费大量精力批评不平等和权力的宰制，社会学家在他们的工作中是一种“沉默的乌托邦”。我希望这篇文章表明，社会学家往往没有对替代世界方案保持沉默。社会学有着丰富的历史，可以从中寻找灵感，辩论和批评。当我们被问到“那我们还有什么选择？”时，事实上，我们社会学家供许了许多答案。■

来信寄给 <Matt.Dawson@Glasgow.ac.uk>

> 形成中的未来

Rainer Rilling, University of Marburg, 德国



什么形塑了我们的未来？
图 S. Vastano/Flickr.

“转型”一词的历史短暂而多变。从日常到政治场域用来描述各种变化，像是政体变革和后殖民秩序发展，到自由民主，资本主义，到全球化资本主义的不同变种，最后，更广泛地说，到“人与自然关系的巨大转型，国家的社会主义秩序的资本主义秩序。虽然经常关注不同行动者如何以及谁一起从“这里”到“那里”的辩论，但转型论述往往以一种相当奇怪的方式忽视了“未来政治”的某些方面。

“未来已经在这里；只是尚未均匀分配”，这是发明了“网络空间”一词的 William Gibson 在四分之一世纪前曾说过的话。然而，他对未来的当前状况和未来的分布保持沉默，尽管这个问题是在几个世纪前就已经存在的问题。资产阶级现代主义的出现不仅彻底改变了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区分，而且将“未来”的意义从被动变为主动（“未来成就”），这也带来了利润，因为要去制定和计算即将到来的时间，像是未来，这因此成为新经济体系的核心。

通过市场和资本，金钱的普遍化，以及它们的领域和社会“脱勾” (Karl Polanyi)，这些所形成的格局是“现在的未来” (Niklas Luhmann)，现在总是存在于任何地方。例如，今天这些是关于金融业主主导的货币，安全的承诺，暴力和军事国家或计算的“未来机器”的扩展等。然后通过地球工程和后化石燃料“绿色资本主义”，在生态永续和经济利益方面做出了贡献。最重要的是，通过所谓的工业 4.0，大数据构建复杂的技术，社会创新，数字社会，智能空间，和统计数字主导的地位，这一切标志着全球已经被整合为当代资本主义和工业化的综合体。

有很多迹象表明，这些变革将再次彻底改变大量与时间相关的个人和社会文化行为模式，以及自 19 世纪以来出现的社会实做，像是预防，抢占，准备，适应（韧性），这也体现了对未来的坚定和持久的承诺。

这些大型格式同时也是未来资本主义的公共且是私人的部分，并且应该在各自未来的不确定性中为利润和权力扫清道路。他们的动态

>>

既不是暴力也不是危机，正是因为尽管他们缺乏同时性，但他们已经发展了自己的身体和权力模式，因此是一种极其变革和的力量。

同时，旨在开拓“未来的大陆”的这些项目中的每一个都产生了新的全球愿景，乌托邦，神话和期望（Jens Beckert）的深度和广度，这是当代的系统可行性的基础。资本主义。这些项目充当“感觉的产生者”（Georg Bol-lenbeck），并为世界及其“现在的未来”提供指导性解释。

当我们构建，讲述，计算，写作，希望，计划，或幻想未来时，会发生什么？未来出现了（实际的，真实的）。未来是通过命名，解释和框架来定义的，并且通过这样做和现在，它们被带入现在，成为“现在的未来”。所有这些利害攸关的所有未来都被命名，理解，解释，使他们现在和准备好决策。整个过程伴随着努力最小化当时的“未来的现在”和当前“现在的未来”之间的差异，因为每个“现在的未来”保持了现在和未来。目前的未来存在，但同时缺席，因为它们没有发生，还没有，也许永远不会发生。正是这些存在于未发生或可能永远不会发生的事物中，使这种现在的未来成为决策，行动或非行动的主体。

因此，关于谁在未来的现在留下了当前未来的“时间印刷”（Zeitabdruck）。其次，现在有必要就面向未来的想法，模型，想象，叙述和行动作出决定，这些决定可以用来产生信任，可信度，接受，认安全，这个特殊的未来，虽然无限期且不可预见，但实际上会发生。这是“未来政治”的精妙所在。它站在摇摇欲坠的脚上，但它们是巨人的脚。

然而，正如英国未来学家 Barbara Adam 所说的，开发现在的未来也意味着将它们从别人手中夺走：“我们制造和拿走未来”，例如，被剥削的，极端贫穷的，无家可归的，无证的监狱囚犯，或难民。在这里，任何霸权的未来都和危机，贫穷，困苦压缩到底：在逆境中生存。因此，它没有时间，没有更好的生活和想象。撙节是对穷人未来的不间断攻击。要结束这个未来的，这个“可能性的仓库”（Luhmann），并且将所有可能与主导项目相反的权力排除在这个结构之外，这是当前的主流未来政治的一个象征。

然而，未来资本主义所承诺的宏大文化和叙事的范围，以及它们在过去 50 年中形成的稳定力量，并不是它所及的范围。在过去十年中，经济危机，社会民主，自由主义秩序模式的迅速瓦解，以及右派暴力政治的兴起，加速

了这种不稳定。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论述正在复兴和更新。自 2008 年以来的金融危机，摧毁了数百万想象中的未来。因此自千禧年以来，这些经验和可能性重新刺激了保守文化的复苏，右派开始召唤历史。因此，过去的政治反叙事在体制和经济上都会增加并稳定自己。

那些想批评，改革，或从根本上改变今天的资本主义的人显然必须处理这样一个事实：即资本主义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未来的社会，并且这个社会以可能的，合理的未来去运作，其当前的信念是对过去政治叙事的大量挪用。■

來信寄給 Rainer Rilling
<rillingr@mail.uni-marburg.de>

> Buen Vivir 的多重声音

Mateo Martínez Abarca, Universidad Nacional Autónoma de México, 墨西哥, Centre for Soci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Coimbra, 葡萄牙



| Arbu繪圖

12

最近几年在拉丁美洲，特别是在安第斯地区，学者对 Buen Vivir 的想法进行了一次重要的辩论。首先是作为 20 世纪 90 年代原住民奋斗的议题，然后作为左翼知识分子和学术界的激烈讨论的一部分，最后，在厄瓜多尔等国家，作为起草新的国家宪法的决定性概念在 2008 年（随后将其翻译成公共政策），Buen Vivir 是一个强而有力的概念，在很短的时间内走了很长一段路。但究竟什么是 Buen Vivir？是否应该将其视为一个与建立替代社会世界具有实际意义的想法？

可以有多个方式去定义 Buen Vivir，这主要取决于它的发音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个假设声音调，用它的语气和力量。因此，Buen Vivir 对所有原住民，或所有原住民

女性，生态运动家，知识分子，非政府组织，甚至厄瓜多尔政府都没有相同的含义。Buen Vivir，从西班牙语到英语的字面翻译将是“好的生活”，最终指向一个丰富而难以捉摸的概念。它是建设中，不容易稳定的，因为不断建设和重建，所以会不断谈判和重新协商。

例如，对于原住民而言，如果不深入了解特定的哲学和现实的表现，就无法理解 Buen Vivir。在厄瓜多，Kichwa 人使用 Sumak Kawsay 的概念作为与 Buen Vivir 相当的概念。Sumak Kawsay 可以被定义为植根于 Pachamama（可翻译为地球母亲）的乌托邦思想，其中人与自然之间的所有社会关系都建立在小区相对于互补，互惠，团结和平等的原则之上。对于 Kichwa 人来说，Sumak Kawsay 可

>>

以被理解为 Llaki Kawsay 的反面，或者说“生活不顺遂”，这是在没有小区的前提下生活中不幸的特征化。玻利维亚的 Aymaras 有一个类似但不同的概念叫做 Suma Qamaña。巴拉圭的 Guaraní 人称之为 Ñandereko，而来自智利和阿根廷的 Mapuches 称为 KümeMongen。

对于知识分子和学者，尤其是拉丁美洲左翼的知识分子和学者，Buen Vivir 与发展，成长，和掠夺开发问题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生活组织下，经济增长依赖于人类生产活动和自然本身的商品化（甚至考虑到“非生产性”的人类和自然过程）。因此，Buen Vivir 将成为市场社会估值模式的根本对立面：对交换价值的使用价值的肯定，正如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材料理论家可能构成的区别。所以，Buen Vivir 不仅意味着努力采取后增长的逻辑，而且还是个后资本主义经济理性。

总之，应该将 Buen Vivir 理解为以非西方本体论为基础的现代性批判，包括那些通常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脉络是殖民地，和欧洲中心主义的全球力量模式的危机中。在理论发展方面，Buen Vivir 从批判理论，后殖民理论，女性主义，文化，种族和性别研究以及政治生态学中汲取了多种见解。但它的历史相关性主要来自社会运动的生活经历，特别是原住民运动，它们将他们的思考和承诺转化为一套理想来指导他们的抗争。Buen Vivir 也一直避免物化，这一概念的流动性构成了其对其他类似乌托邦式建议的的巨大优势之一。

Buen Vivir 也被连结到了新的实用的概念，这主要是关于在抗争中遇到的挑战。一个例子是 Kawsak Sacha 或生活森林的概念，这是厄瓜多尔亚马孙河流域的 Sarayaku 原住民所创造的。该想法的诞生是为了应对其土地的石油开采威胁，去培育小区的“生命项目”，作为自 21 世纪初以来掠夺开发模式的替代方案。几年后，Sarayaku 在 2015 年 COP 21 巴黎气候峰会上以及随后于 2016 年在夏威夷举行的 IUCN 世界自然保护大会上提出了 Kawsak Sacha 想法。

Buen Vivir 不仅仅重新激发了“祖先世界观”，尽管它确实从原住民人民的历史记忆中拯救和振兴了几个传统元素。相对的是，这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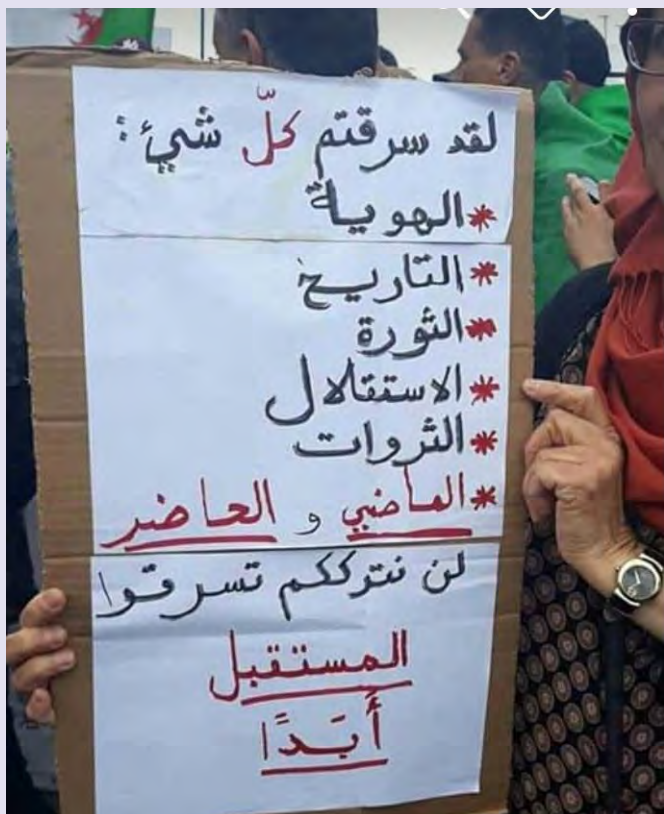
概念坚持非常进步的思想与实践，不断适应现实的变动，在这种变动中，劳动和自然的永续是核心。来自全球北方以及全球南方的学者和运动家的一种典型错误是认为 Buen Vivir 是新时代的灵力，像是原住民及群聚集在满月下打鼓，世界则在他们周围坍塌。通过这种玫瑰色的理性实用主义视角来观察 Buen Vivir，无意中促使这个概念的非政治化，这种提议是以其最纯粹的形式，是一种本质上的政治挑战。

诸如此类的解释性错误，以及某些政府将其原则的去政治化共谋作为一种专门用于国家逻辑的理论，已经使 Buen Vivir 成为一项激进的改革主张。在厄瓜多，其中 Buen Vivir 自 2008 年以来一直是国家宪法的一部分。尽管核心具有变革的潜力，但在政府的特定政策下，Buen Vivir 的所属权与在南美洲所谓的“粉红潮”相一致，当政权进行专制和遭受一系列腐败丑闻时，最终官僚系统耗尽了其对厄瓜多社会的治理能力。然而，这种巧妙的反政治实验的短暂挫折，刺激了多个选民之间必要的批判，更新，和学习。这些选民继续认同并相信。最后，这些诸众将会对 Buen Vivir 作为他们斗争中的哲学和政治工具的未来进行发言。■

來信寄給 Mateo Martínez Abarca
<abortocronico@gmail.com>

> 阿拉伯世界的另外的未来

Abdelkader Latreche, 社会学家和人口学家, 卡达/阿尔吉利亚



在阿尔及利亚的抗议活动，一张标语写着：“你偷了一切：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历史，革命，我们的独立，我们的资源，我们的过去和现在。但你永远无法偷走我们的未来。”照片：Abdelkader Latreche。

拉伯社会的停滞不进，并催生了新的现代政治空间。

阿拉伯国家的独立之前和之后，阿拉伯人，阿拉伯国家，阿拉伯国家的未来等的概念一直存在于阿拉伯思想、政治运动、和政党之中。要了解这个运动，我们不能脱离阿拉伯国家的当代历史，特别是文艺复兴运动 (Nahda)，去殖民化，现代化，新民族国家的建立，因为这与阿拉伯统一的概念完全相关，也和几十年的阿拉伯共同运动息息相关，也存再于阿拉伯梦想相关各种文学著作，艺术，体育等其他领域之中。显然，阿拉伯人未来的想法跨越了世代，变得更具挑战性。

> 另一个未来

独立建国以来，阿拉伯国家通过建立和采用新的制度，法律，和立法框架，以及各种国家和地区发展政策，去进行国家管理现代化。这些现代画室需要动员大量国家资源的，而且都依赖一个主要的财富来源：石油或天然气，以其旅游业或农业。第一产业的危机，像是石油和天然气价格的波动，都造成财务的赤字，让公共投资却步，从而导致经济和社会的危机。所以，阿拉伯经济的特殊性，以及其对于一个部门的完全依赖不能再继续下去，否则只会恶化；因此，阿拉伯国家必须用不同方式管理其经济，并改变使用资源的方式，特别是使用石油和天然气。要带来这种变化，即“大破”，需要经济的多元化，摆脱对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提高制造业的价值，并在地化。此外，也必须消除性别，年龄，宗教，种族，以及经济，社会，区域和部落归属等所有的排斥。总之，阿拉伯国家未来的稳定是需要其政治制度的改革和现代化的，这是为了让所有人口能够参与，并打破社会领导 (président à vie) 的概念，因为这种概念在整个阿拉伯政治中是主流。然后也要提高国家政治制度的效率以，以

预测，探索，塑造阿拉伯世界的未来是一项非常具有挑战性和艰巨的任务。它具有挑战性是因为其涉及对国家的未来，而要去将国家的过去的辉煌与现今的苦难分开。这些是传统 (qadim) 和现代 (jadid) 之间的永恒辩论，也是寻求更美好未来的破裂和连续之间的永久辩证。这种寻求新的“阿拉伯国家”神话的是“很难的，因为自十九世纪以来阿拉伯国家一直处于改变状态：去殖民化后，民族国家的建立，出现了由分裂和冲突以及寻求改变 (tajdid) 所引起的不同类型的危机。通过解放的革命，求变（现代主义）的一方反对传统主义，断裂因此而生。这也是为什么阿拉伯国家总是表现出弱的样子，也希望一切重来，特别是其发生的革命中，就像是欧洲十九世纪的革命，之后就是不希望历史重演，其像征必须被摧毁。相比之下，未来是变化，破裂，和现代主义的代名词，这正如十九世纪阿拉伯复兴运动中所看到的那样，所以该运动谴责阿

及现代化和专业化；这些需要被赋权，给予自主性。

阿拉伯的“替代”未来也涉及通过采取加强地方（个人或团体）计划的战略去破坏，打破传统，以创造参与经济，政治的“新公民”社会。这种参与需要通过建立多元自由和自治的社会，以及专业的民间社会，让不同群体参与其中，例如企业家，专业人士（律师，工程师，教师），学生，年轻人等。另外，也需要就制定国家政策进行一般性的辩论。这并非代表着国家治理能力的降低，而是非政府合作伙伴的有更多的参与机会，以便建立一种包容民主的治理形式，从而强化治理与被治理之间的关系。

这种行为和思想的大破还涉及对治理的类型和模式以及阿拉伯国家女性地位进行负责任和勇敢的讨论，要避免一切形式的民粹主义。还有要冷静理性地讨论伊斯兰教在社会中的地位，以便重新肯定其在国家内的核心地位。

到 21 世纪末，阿拉伯国家的未来不会完全依赖于制度的断裂，因为还将取决于阿拉伯人如何看待他们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这无论是作为国家还是作为地区，都是重要的。他们是否永远只是石油和天然气的生产商，以及各种消费品的进口商？阿拉伯地区是否会成为冲突和战争的地区，生产越来越多的难民并将人们排除在外？或者，阿拉伯国家是否会形成一个稳定的地区，没有冲突和流离失所者，并且拥有强大的社会保障和良好的教育和卫生体系？新的阿拉伯世代将在工业，医学，技术和科学方面产生什么影响？他们的贡献是什么？

不同制度和行为的断裂的相互作用应与阿拉伯国家在世界上的新角色和地位的出现和演变同时发生。这不需要特殊的立法，也不需要去相信另一个阿拉伯世界的可能，因为这可能是阿拉伯人讨论未来的起点。这一未来不仅限于政治改革和统一，而是旨在根据阿拉伯国家的务实，根本和共同利益，维持稳定，预防和解决冲突，繁荣，安全，区域间交流和合作。

21 世纪末阿拉伯人的未来必须从现在开始规划，以便后代继承新阿拉伯世界的基础，这些基础必须在内部启动和设计，而不是从外来进口。这不会完全和过去的所有成就断裂，因为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阿拉伯国家经历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应该被用作建设未来的基础。现在我们必须将未来视为优先事项，以避免重

蹈覆辙。

阿拉伯人以及他们的邻居和朋友所渴望的阿拉伯新世界是多元的。断裂之处，必须通过对话和交流，而不是通过暴力和排斥来展开。这是当代和未来阿拉伯人最重要的挑战之一。因此，阿拉伯人的未来必须成为今天所有阿拉伯人的优先关心事项。■

來信寄給 Abdelkader Latreche
<ablatre@yahoo.fr>

> 污名如何限制了政策

南非拾荒者的例子

Teresa Perez, 开普敦大学, 南非



南非废物收集协会。版权：SAWPA。

我在开普敦待了七年后，上个月我打包完了最后一箱东西，搬回了英国。我把不要的东西放在我家外面，一小时之内就消失了。拾荒者收集，分类，出售我的东西。这对我来说相当迅速又省事，大大减少资源的浪费，同时创造收入给其他人。但是对于其他邻居来说，我用这种方式会把拾荒者引来，这是不负责任的，因为这些人乱花钱，喝酒吸赌等等。几个星期后，小区守望队就会对隔壁偷窃案认为：这些所谓的“拾荒者”是犯罪分子的眼线。

这种两极分化的态度，我们可以从政策尚未克服拾荒者所面临的污名化的角度来理解。负面刻板印象会让废物收集有可能无法成为“绿色工作”，或者让废物收集者无法成为回收行业的雇员。“拾荒者”一词具有负面含义，导致有“废物回收”之类的其他词语。

我对“拾荒者”的使用与南非废物收集者协会(SAWPA)和全球联盟使用的语言相呼应。我们要为拾荒者们追求更好的工作条件。但是，至今对于应该支持废物收集者的工作情况（如果有的话）到什么程度没有达成任何共识。

> 政策和形象

在不同政策和地区之间的各种立场加剧了拾荒的模糊地带。全球上，废物收集属于国际劳工组织的“有尊严劳动”议程。废物收集者被描述为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一环。这意味着废物收集者是全球南方绿色经济中的潜在劳动者。与全球北方，其有时被称为自由业者或垃圾筒专家不同，废物采集者也与环境运动不一致。拾荒者很少被视为是积极的职业选择，而是与没有选择的。这张图片在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政府可以选择采用更多

>>

劳动密集型方法来减少可能使用拾荒者的浪费，但这表明贫穷程度很高。另一方面，他们可以采用技术解决方案，例如“废物转化为能源”，仿效现代欧洲方法，但创造更少的就业机会，不太可能被目前作为废物收集者的人的就业选择。

开普敦成为 2017 年非洲第一个大型垃圾焚化炉的火力发电厂的所在地。鉴于电力短缺以及在撰写本文时经常的断电，国有化公电力供应业者 (Eskom) 是好的选择。好处是，工人（大约 80 人）不必在垃圾场捡垃圾。事实上，这与其他帮助废弃收集者组建合作社的地方政府不同，在开普敦，在垃圾掩埋收集垃圾是非法的。这之所以是可能的，是因为尽管国家立法（“废物法”）规定地方政府必须制定废物管理计划，但实现零浪费的方式完全由当地政策制定者自行决定。在努力想成为“世界城市”的地方，现代化形像对于吸引外国投资非常重要。例如，为举办 FIFA 世界杯等活动做准备，街道垃圾回收机就被拆除，任何垃圾回收往往被官员视为自愿的，但是并不鼓励的，因为居民的抱怨，而且特别是在历史上“白人”的郊区，居民会将垃圾与犯罪联系起来。

居民的观念

绿色工作的扩张并需要有公众参与，路边垃圾收集的成功依赖于居民将他们的垃圾分类，并队垃圾回收者帮他们的家庭垃圾进行垃圾分类感到高兴。目前，垃圾拾荒者努力将自己塑造成一种劳工，以及公共服务的形象。但是人们怀疑这些人的来历，以及其动机。若单就外观，废物收集者与贫穷流浪者没有什么不同，通常被标记为“bergies”，人们认为通过垃圾箱是一种和与朋友和家人断绝关系的人们的最后手段，也就是那些“正常”人们在需要时可以依赖的关系。废物收集者的外表也会被人怀疑。许多废物收集者都有纹身，伤疤和其他标志，这些标志可作为诋毁的符号。这使得他们很难将自己呈现为更生人。相反，废物收集者似乎是怪人。缺乏互动的结果代表居民依赖其他消息来源来去打量拾荒者。

富裕的郊区的私人保全建议不要把废弃物给那些拾荒者的作法是加深对这些人的偏见和歧视；这也使得污名更加恶化。同样，小区守望队无法分辨拾荒者人和入侵者。居民们与议员一起建立小区巡逻队，然后根据“种族”，

年龄和性别进行筛选，删除任何被视为对安全和安全构成威胁的人。居民的 Whats App 团体使用“BM”作为“黑人”的代号，好跟踪可疑的人。因此，拾荒者必须不断协商进入街道和家庭垃圾场的方式。目前，拾荒者是不太可能被公众视为服务工作者的。除了南非部分地区的政府支持以及宣传以外，废物收集者仍处于边缘地位。因此，旨在帮助废物收集者组建集体或成为雇员的政策，如南美洲部分地区在做的，并未纳入那些被污名化的人。

由于全球和地方的政策不一致，污名是南非废物拾荒者的一个限制。工人的蔑视所造成的普遍刻板印象受到历史的加强，使他们无法获得参与绿色经济所需的资源与支持。废物收集者被看成为流浪者，酗酒或吸毒，非理性，以及对富裕郊区的安全和保障的极大威胁。废物收集被视为落后的，肮脏的，并且是减少浪费的无效方式。根据将废物收集者和废物收集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指示者的政策，其消极性将持续下去。因此，在旅游业和商业发达的城市中，机械化的垃圾回收可能比劳动密集型的方式更受欢迎。■

来信寄给 Teresa Perez

<tpz031@googlemail.com>

> 适应气候变迁

津巴布韦小农的例子

Christopher Mabeza, Zimbabwe Open University, 津巴布韦

全球气候发生巨大变化事无可置疑的。气候变迁正影响着世界，但是影响并不均匀，而发展中国家的人民首当其害。津巴布韦是个最好的例子。津巴布韦的乡村景观被气候变迁着力甚深。小农若遇到，其生计受到极大影响，所以降雨量的变化带来很大的破坏。以往研究忽略了农民在气候变迁危机前线所扮演的角色。但是面对气候变迁，小农们已经为气候变迁想出并采取适应性策略。可悲的是，他们的创新往往像是结婚的新人一样，并没有参与真正的政策制定过程，这些政策却又往往在帮助农村小区适应气候变迁方面有着关键角色，而且技术转移似乎影响政策如何看待适应气候变迁。本文认为小农的适应策略在农村发展中至关重要。

津巴布韦农村小农的计划核心是一种实验的精神。这些计划也表现出他们的坚韧不拔。可是这些创新却是通往死胡同，无法解决小农的生计问题。他们需要其他的解决方案，用一部分修复的方式去适应气候变迁。因此，这意味着没有单一的解决方案，而是多种解决方案的合作以应付气候变迁的影响。

自远古以来，津巴布韦的 Shona 族已经慢慢适应了气候变迁。他们是该国最大的族群。其为努力工作而自豪，唾弃懒惰。其仰赖大地去确保他们在桌子上有食物。他们的生计依赖于雨水灌溉的农业。在这些农民中，有些人已经成为农业专家并可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气候环境。这些有成就的农民在当地被称为 hurudza。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农民被称为 mutambanevhu（“玩”土壤的人）。他们是勇敢的实验家，多数创新方案都以节约用水为前提。

集水越来越成为农民适应降雨变化增加的可行选择。这可行的原因是在这些边缘地区，雨水来的快，去的也快。在津巴布韦农村的一位世界闻名集水专家：已故的 Zephaniah Phiri 因其集水技术而获得国家地理奖。他收

集的水在是从他家附近的一块岩石露头上流下来的。他说，“我已经嫁给水和土地了，这样他们就不会私奔和逃家，我们是一个家庭。”这意味着他的创新点子防止土壤侵蚀，确保他收集到大部分水去用于灌溉他的作物。大多数小农户收集流水，将其引导至他们在家中建造的小型水坝（见图 1）。他们用水做市场园艺。其他自称为“侵蚀杀手”的人在沟壑上筑起一堵墙，从而将其变成一个小坝，也用于市场园艺（见图 2）。通过这样做，他们遏制了沟壑的侵蚀。

在津巴布韦的一些农村地区，NGO 团体启动了保护性农业 (CA) 的计划去帮助农民适应气候变迁。CA 的想法是对土壤产生最少的干扰已达到水源保护。大多数实行 CA 的农民都使用草覆盖法（见图 3）。一些创新的 CA 农民使用旧罐子制作雨量计（见图 4）。

津巴布韦农村的气候变迁带来了新的运动，即“蓝色革命”。蓝色革命是养鱼业的运动。鱼类养殖比畜牧生产更“绿色”，因为它排放的温室气体较少。令人振奋的是，鱼类养



1 小农的水坝去灌溉番茄。



2 小水壩是侵蝕的殺手

殖正逐渐变成津巴布韦一些地区的主要经济。小农在会家中建造鱼塘（见图5）。

其他农民正在饲养放养的鸡，或者我更喜欢称之为“无国界的鸡”。无国界的鸡已经成为许多小农的一种流行的养鸡策略。这些农民是基于这样一种理解：对气候变迁的合理反应是在其中寻找出路。一些农民养了多达2000种无国界的鸡，在邻近的城镇，特别是在首都Harare出售他们的鸡，那里对有机的鸡的需求量很大，因此，生意非常好，农民都希望增可



3 草被用來覆蓋



4 Shurugwi的保護性農業

以养更多的鸡去出售。

积极的农民正在创造多样化的生计选择。他们收获非木材森林产品，如mopane蠕虫，当地人称为amacimbi（见图6）。Amacimbi是一种美味佳肴，有一定的市场。所得收入被用于购买食品并支付学童费用。

小农在气候变迁适应论述中扮演关键角色。他们比政策专家更了解他们的环境，是关键的知识宝库，可以用来帮助小区适应气候变迁。政策制定者需要小农们接受这些创新的想法。■

图片来源：Christopher Mabeza

來信寄給 Christopher Mabeza
<cmmabezah@gmail.com>



5 小農的池塘



6 amacimbi蟲

> Erik Olin Wright: 实存乌托邦¹

Michael Burawo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美国



Erik Olin Wright谈「时存的乌托邦」。罗莎 - 卢森堡基金会/
Flickr的

这 从哪里开始？很难讲耶。Erik 本人喜欢乌托邦思想的兴趣可以追溯到 1971 年，当时他是在 Berkeley 是一神论者，普世主义神学院的学生，为了躲避兵役征召，他组织了一个名为“乌托邦与革命”的学生研讨会，讨论美国社会革命性转型的前景。然后，他作为学生牧师在 San Quentin 州立监狱工作，并加入了一个致力于监狱改革的活动组织。

这使他准备好成为了在辉煌的七十年代初的一名杰出的 Berkeley 大学的研究生，并成为当时顶尖的知识分子之一：将社会学重塑为马克思学说。因此，Erik 的论文挑战了主流社会学，这不是出于意识形态，而是出于科学理由。他证明了重建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定义可以比现有的阶层化和人力资本理论模型更好地解释社会人口的收入的差距。

在他挑战社会学的同时，Erik 也在重塑马克思主义。中产阶级长期以来一直是马克思主义一方的荆棘，中产阶级应该解散，但是越来越大。Erik 与 Luca Perrone 一起用“矛盾的阶级地位”的概念来解决这个难题。有三个矛盾：小资产阶级和大规模资本之间的小雇主；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监督者和管理者；雇佣劳动者与小资产阶级之间的半自雇员。

Erik 于 1976 年在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 Madison 担任助理教授，开始其阶级分析的研究。由于当时的社会调查并不是在创造新的阶级类别，于是他执行了自己的全国社会调查，旨在测量其阶级类别。在这个马克思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其的思想很快被传播开来，于是很快他就组织了其他十几个国家的团队，进行了同步调查。

如果有一个贯穿他的学术工作的主轴，那

>>

就是通过他的生活哲学：决心。这不仅需要在理论和实证研究之间密切的来回对话，还要深化其经验分析的内在逻辑。我们可以透过他的书来追溯他的思想演变，从“阶级，危机，和国家”（1978）开始，紧接着他的论文“阶级结构和收入决定”（1979）的出版，然后到了更深层次的转变。他采用了 John Roemer 在阶级上的剥削概念（1985），以及他在“对阶级辩论”（1989）中对他的批评者的响应。

1981 年，Erik 加入了一群精英的社会科学家和哲学家，其中受到哲学家 G. A. Cohen 和 Philippe van Parijs，以及经济学家 John Roemer 的影响最大。他们开创了“分析性马克思主义”，更通俗地称为“不废话的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在对彼此工作的无限制批判。

虽然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对乌托邦思想过敏，但在 1989 年之后，政治的现实要求了乌托邦的思想。Erik 接受了挑战。他直接反对新保守主义的想法，通过提出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提出了社会主义纲领，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发现其思想的实证。

新计划开始于 1991 年，也就是苏联解体的那一年。Erik 举行了一系列会议，讨论“实存乌托邦”，不是空谈的理想，而是在现实社会中可以找到的真正的替代世界。会议主题包括民主，市场社会主义，参与式民主，普遍收入补助，和性别平等。这些会议论文发表在 Erik 编辑的系列丛书中，最终以他自己的大部头巨著“Envisioning Real Utopias”结束。

Erik 將社會學交回給其發明人 馬克思，涂爾幹和韋伯的手中，這些人把理論建立在道

德價值上的興趣少於今天的專業學者。Erik 明確地將社會學的研究定義為理解實現這些價值觀的制度可能性。

Erik 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裡發現這些真正的烏托邦對運動家非常有吸引力。他花了很多時間環遊世界，與那些熱衷於將他的意識形態和知識框架與他們自己的研究聯繫起來的團體交談。因此，他開始以一種方便呈現的形式去實踐實存的烏托邦，消除了學術聒噪的混亂場景，寫了一個他稱之為“如何成為 21 世紀的反資本主義者”的反資本主義小冊子。

那些在民間社會的戰場中的人們聽到這個正面的消息可謂相當興奮。他是一個知識分子正在向民間人士的看不見的工作致敬，反對資本主義，不論是忍受侮辱和報復。

Erik 給我們留下了一種思維方式和一種存在方式。我直說好了，我知道沒有人比 Erik 更清醒，更有力，更快速，更輕鬆地思考，沒有人可以像他尖銳地剖析任何問題，任何論文，任何書籍。我們望其項背，但我們可以從他中獲得靈感，在他的地圖的引導下跟隨他的步伐，在我們前進的過程中重創造前進。■

註 1：這是發表在 Jacobin (1/2019) 的簡短版本。原版本可以在[這找到](#)。

> 纪念

Erik Olin Wright

Michelle Williams, University of Witswatersrand, 南非

我将 Erik Olin Wright 视为导师，合作者，朋友，以及同好。对他的称赞主要放在其知识上的贡献，优秀的指导学生能力，对超越资本主义所作的努力，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虽然我也都同意 Erik 的这些方面，我这里则要聚焦在 Erik 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的这一面，他有许多奇特的激情，有感染力的想象，以及对人类创造性的热情。

我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第一次见到 Erik，他每年都会拜访他最亲密的朋友 Michael Burawoy，而 Michael 是我的指导老师（我在 Berkeley 大学读研究所）。我们的第一次谈话中，Erik 对我说，“你知道我是你的叔叔吗？”我回答说“真的？”我不懂。然后他就解释说 Michael 是我的学术上的父亲，而他是 Michael 的兄弟，所以 Erik 就是我叔叔了！我立刻觉得，这就是他将我融入他的世界的方式，也是 Erik 热情地拥抱他人作为他家人的一部分的方式。他总是可以将人融入其网络，像是建构出来血缘关系那样。而从我认识 Erik 以来，我们无话不谈，无论他是在解释理论建构和概念建构之间的区别和难处，或是我们对南非和 Kerala 共产党的讨论，或者关于什么让反资本主义的运动成为可能，还是分享我们最喜欢的非小说或小说，甚至戏剧（他喜欢南非政治戏剧），或讨论食谱和如何让他喜欢的鸡肉 Coq au Vin 融入道素食中（他称之为 Coqless Coq au Vin - 在我试吃之前可是说相当怀疑哪！）。Erik 总是热情，开怀。他对 Berkeley 的年度访问让 Michael 学生相当欢乐，因为 Erik 总是会做出美好食物，并邀请我们去 Michael 的公寓（学年度结束剩余时间我们总是不得不把食物带到 Michael 公寓，因为他不会烹饪）。

另外，我与 Erik 的联系加深了我们对寻找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承诺，特别是与合作社，以及我与合作伙伴 Vishwas Satgar 探讨的团结经济。不过，虽然我们同意具体的替代方案思考的重要性，但我们并不总是同意所有的细节部份，而我经常不同意他的尖锐分析取径，介绍文化观念，意义生产的重要性，以及现实的

混乱。但 Erik 从不感到挫折或不满，而是喜欢创意的讨论，甚至设法让我觉得他没有不同意，但也没有同意。他很慷慨，我知道他至少有两次写信给作者 Rohinton Mistry 和 Zakes Mda 去感谢他们的政治小说。当他在约翰内斯堡的一次访问中看到 Mda 的“月亮垂死的呐喊”时，他几乎流泪，并直呼这是他看过的最好的戏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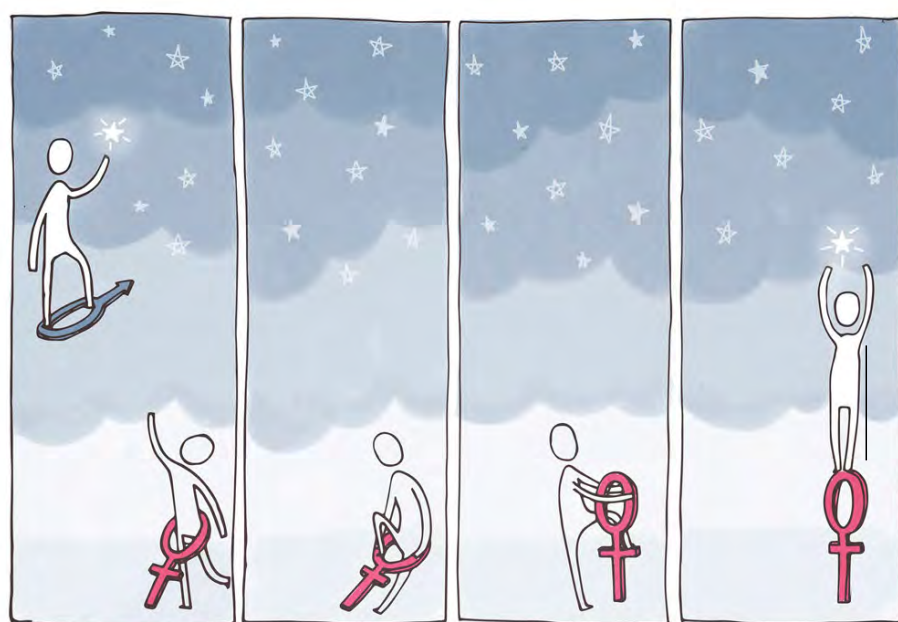
虽然我在 Berkeley 认识了 Erik，过去二十年里，我们友谊的建立却是透过前往许多遥远的地方旅行：Kerala, Barcelona, Goteburg, Buenos Aires, Padua, 他还去过南非三次。我们第一次远方的见面是在 2000 年在印度 Kerala（我刚开始在 Kerala 进行田野）。在 Kerala，我认识到 Erik 如何与各个年龄的人交朋友：有一次，他对着在农村的一个山区村庄

「Erik 始终是一个热心，仁爱，热情洋溢的人文主义者，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社会学家和马克思主义学者。」

里的一群学童唱着“她将要下山”。也许我最喜欢的一次是 Michael 和 Erik 都在约翰内斯堡的那次，当时我们三个人一起共进晚餐时，我有幸地看到他们两个人在一个多小时内就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很深的辩论，内容不但有趣，而且参与方式也非常有趣。Erik 的冷静是很深远的！事实上，Erik 的情绪似乎从未受到太多其他因素影响（包括睡眠不，不适或疲惫）。我的经验中，Erik 始终是一个热心，仁爱，热情洋溢的人文主义者，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社会学家和马克思主义学者。 Hambe Kahle Erik ! ■

> 把性別和不平等連 結起來：導論

Birgit Riegraf, Paderborn University, 德國, ISA女性、性別、社會研究委員會 (RC32), Lina Abirafeh, Lebanese American University, 黎巴嫩, Kadri Aavik, Tallinn University, 愛沙尼亞, University of Helsinki, 芬蘭



平等不是個人私事，而是需要在結構，政治，社會和經濟層面處理。照片：Nguyen Hai Ha / Flickr。

性別和社會不平等是社會學、性別研究、和無數其他學科的研究的關鍵領域。這些研究領域的一個重要共同發現是：女性佔了全世界貧窮人口和邊緣化群體的很大一部分。根據 2018 年世界經濟論壇的全球性別不平等報告，若要縮小全球經濟性別的差距，可要 202 年的時間。

經濟不平等有多種形式，例如，根據 [2018 年全球性別差距報告](#)，只有 41% 的受訪國家的女性能擁有土地。在專業領域中，只有 34% 的管理職位由女性擔任。女性在非正規經濟中的角色也是一種挑戰。女性佔非正規經濟部門的大多數，她們在無償工作上付出的勞動時間是男性的兩倍。由於非正規經濟不受管制，女性特別容易受到剝削和虐待。透過有意義的政策改革，我們可以顯著改善其中許多的面向。也就是說，女性是他們自己最好的倡議者。可是她們在政治上仍然缺乏代表性。在接受調查的

149 個國家中，只有 17 個國家的女性擔任國家元首。此外，全世界只有 18% 的部長和 24% 的議員是女性。

儘管有些國家實現了更廣泛的性別平等，且取得很大進展，但在女性的各種交叉身份基礎上，例如種族，階級和性氣質方面，女性的機會仍然存很低。雖然一些享有特權的女性從這一進步中受益，但其他女性繼續生活在不穩定的條件下。在個別國家內，不同社會和文化脈絡下的女性，其差異也正在增加。這些差異對社會保障和女性機會有重大影響。例如，根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數據](#)，美國的孕產婦死亡率相對較低，在接受調查的 182 個國家中排名第 54 位。然而，[根據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管制中心的資料](#)指出，黑人女性的孕產婦死亡率是美國白人女性死亡率的三倍多。

雖然許多州繼續取得進步，但速度各不相同。全球上的性別不平等差距，其中以中東和

>>

北非是差距最大的區域，但是其改善女性社會地位的進步率卻是要優越於北美地區的。根據統計，南亞可以在 70 年內縮小性別不平等，北美，中東和北非差不多要一個世紀。然而，當進一步審視該地區時，人們可能會問，其統計數字對於緬甸流離失所的羅興亞女性是否具有長程的意義，因為其遭受到種族清洗的對待，生活在極不穩定的環境中。諸如此類的案例迫使我們質疑我們是如何界定和衡量有關性別不平等的進展的。

本期全球對話闡明了性別和社會不平等如何相關，以及如何形成的相當大的社會空間差異，目的是為這些不同的社會動態提供一個反思起點，並為進一步的研究和討論創造空間，期望對女性的社會地位的政策制定產生影響。

Liisa Husu 認為，儘管全球女性在高等教育方面取得了巨大進步，但職位越高，越少女性，則此趨勢就越惡化。在她的“研究經費的性別挑戰”中，從歐洲和北歐國家的角度討論了代表性不足的影響。

Blanka Nyklová 在“挑戰捷克的性別平等”中概述了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和保守主義如何影響中歐的性別和社會不平等，特別是捷克。她利用扭曲解放的概念來解釋女性所爭取的特權如何進而犧牲其他女性。

在“堅持與變革：美國的性別不平等”中，Margaret Abraham 討論了我們如何分析美國爭取平等的成功，以及怎麼理解這過程中所遇到挫折。她認為，這些平等和正義的成就不是不證自明的，而我們必須在社會行動和社會學分析中有所進步才行。

Lina Abirafeh 在她的文章“阿拉伯地區的性別和不平等”中探討了阿拉伯國家的性別

不平等。該地區長期經歷了經濟和政治上的不安全，加上社會文化障礙和根深蒂固的父權體系，情況只有更糟。在許多情況下甚至逆轉抵銷性別平等的進步成果。阿拉伯如果沒有性別平等，那不會有和平繁榮的未來。

Nicola Piper 的文章“亞洲論述脈絡下的性別勞動和不平等”研究了亞洲的性別化勞動和不平等，並指出其持續的人口遷徙已成為學者和運動者關注的焦點。特別是女性移民集中在被女性化的場域，沒有權利和保護。他們的遭遇的挑戰和脆弱是亞洲性別不平等的核心。

在他的文章“IPSP：社會進步之一些性的別反思”中，Jeff Hearn 反思了國際社會進步小組 (IPSP) 報告的撰寫過程和結論。他報告中提出了關於如何概念化性別的建議。■

來信寄給：

Birgit Riegraf <birgitt.riegraf@uni-paderborn.de>

Lina Abirafeh <lina.abirafeh@lau.edu>

Kadri Aavik <kadri.aavik@tlu.ee>

> 研究經費的性別挑戰

Liisa Husu, Hanken School of Economics, 芬蘭, Örebro University, 瑞典, ISA科技与社会研究委员会 (RC23), 女性、性别、社会研究委员会 (RC32)

學術界中，性別不平等是一個長久以來的全球性問題。只有三分之一的研究人員是女性。職位越高，女性越少，這長久以來持續存在著。儘管女性在全球高等教育方面取得了巨大進步，但是多數教授都是男性，符合最近的歐洲和北歐統計數據所指出的，對教授的性別平等的趨勢的變化速度非常緩慢。

> 研究經費有性別中立嗎？

獲得研究經費不論對學術中的女性或男性研究者來說，都是關鍵的。多數國家，這意味著尋求外部研究經費的能力，因為這通常都是通過激烈的競爭而取得的。對研究經費的性別面向之研究並沒有發現在所女性獲得研究經費的比例降低，而是描繪出了一個更複雜的圖像，與研究人員，研究團體，大學，資助單位，研究內容，以及政策都習習相關，也與經費分配，經費審查把關者，同儕審查，資助組織，管理，政策和實踐，以及如何去定義優秀與傑出是有關的。最近的研究發現，若要有性別和研究經費分配的改善，那就要以更廣泛和更全面的方式批判性地審視整個研究經費的周期。

對研究經費中性別面向的理解包括整個經費周期以及性別的影響：沈請行為（申請者），申請人總體（有資格申請者），研究團體的構成，經費方式，申請人的指南，資格標準（年齡或職位），評估標準，評估程序，評估的潛在偏見，同儕審查者的招聘，同儕評審的過程，成功率，應用和分配的經費數額，研究內容，經費資助者的政策聲明，性別平等，籌資系統的總體透明度，性別的統計數據以及獲得經費的長期職業影響有關。

而大家特別感興趣的是所謂的卓越經費補助方式：傑出中心，不同的傑出卓越計劃，傑出的教授等。最近的幾項實證研究和監測表明，這些卓越政策讓男性比女性研究人員受益更大，這即使在瑞典等性別平等總體標準較高的國家也是如此。

正式和非正式的學術網絡在追求經費補助方面是發揮着重要作用的。許多領域的研究經費是補助團體，而不是個人。在這方面，學術網絡的性別因素和融入研究環境的研究具有高度相關性。

> 歐洲的經驗

研究經費是國家和地區研究政策中的關鍵問題。自 20 世紀 90 年代末至 21 世紀初作為政策問題，在歐盟以及一些歐洲國家的國家政策中，研究經費中的性別問題已經被提出。自 20 世紀 80 年代中期以來，歐盟的研究經費是一種“框架計劃”。第一個歐洲框架計劃顯然缺乏社會科學，除了對科學技術的輔助，沒有其他的了，其並且對性別問題保持沉默。只有第四個框架計劃（1994-1998）開始才補助社會科學研究的經費，並且性別問題開始在議程上被提出，並且自 20 世紀 90 年代後期開始逐漸擴大，從最初處理“科學中的女性”到審視學術研究中的性別，包括研究內容中的性別面向，以及關注研究人員和研究團體，還有審查者的性別平衡。在歐洲研究區（ERA），性別平等是五個優先事項之一。這涉及三個問題：研究團隊中的性別平等，評估者之間的性別平等，以及研究內容中的性別面向。

歐洲政策工作的一部分是 2009 年第一次對

“政治意志的擁有或缺乏在公共經費資助組織如何優先考慮性別平等和解決研究經費中的性別問題，是有著重要作用的。”

33 个国家的性别和研究经费进行的系统评估。它发现整个欧洲在国家研究政策和国家资助机构如何处理性别问题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包括“相对不活跃”，几乎没有任何国家研究经费在许多国家的性别监测，各种主动措施，监测和在少数国家，包括北欧地区，积极参与促进国家筹资系统中的性别平等。

欧洲研究委员会 (ERC) 的总部成立于 2007 年，其宗旨在为任何学科和任何国家的青年，中期，和资深研究人员提供研究经费，其预算为 13.1 欧元 (2014 - 2020)，然而，尽管欧盟研究政策中存在性别面向，但 ERC 在最初在其治理原则中也缺乏性别平等。当 ERC 最终开始按性别去考虑其经费分配时，结果发现，在 2007 到 2013 年，男性的成功率为 30%，女性为 25%，这是刚开始阶段的计划，而高级经费申请成功率则为：男性 15%，和女性 13 %。只有在一个领域在起始阶段没有性别差异：物理和工程科学，这是一个男性主导的研究领域。在传统上有许多女性的领域，例如生命科学，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结果发现了男性的成功率有明显差异。

政治意志的拥有或缺乏在公共经费资助组织如何优先考虑性别平等和解决研究经费中的性别问题，是起着重要作用的。例如，北欧社会在国际性别平等中排名很前面，在全球创新指数中也很前面。性别平等在研究政策的制定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这特别是在挪威和瑞典。在瑞典，公共经费研究资助组织，像是瑞典研究理事会和国家创新机构 Vinnova，都有政府政策规定将性别问题纳入讨论。在评估发展方面，瑞典研究资助者不仅在资助委员会会议上

纪录统计数据，还使用性别观察员等质化社会科学方法去评估。

自 21 世紀初以來，在芬蘭，挪威，和瑞典，公共研究資助委員會的性別平等已成為一項被實現的政策目標，但在許多歐洲國家，委員會仍然被男性把持。經費籌備委員會的性別平等不單單是一個代表性和公正性的問題而已，在這些把關位置中的性別平等也相當重要，因為它提供了關於經費資助系統如何運作的內部知識，並促進了相關人員的網絡。■

來信寄給 Liisa Husu <liisa.husu@oru.se>

> 捷克的性别不平等

Blanka Nyklová, Institute of Sociology of the Czech Academy of Science, 捷克



MASARYKOVA UNIVERZITA
FAKULTA SOCIÁLNÍCH STUDIÍ

 Genderová studia FSS MU

Brno被解散的性别研究中心。

今年我们庆祝欧洲解除铁幕 30 周年，但也是新自由主义被看成民主的唯一方式的 30 年。民主被视为一种精英政治，解除了以共产党身份为基础的前权力结构。这一时期的媒体赞扬精英主义，并把不平和不公平归因给个人，然而，捷克目前的总理在 1989 年之前是一名秘密特工，他和大多数捷克亿万富翁一样，通过私有化将他 1989 年以前的特权转变为经济资本。同时，恶法让近十分之一的人口陷入债务危机，大约有 7 万名无家可归者和 12 万多人面临失去家园的危险。这里我概述了 Central European Visegrad Group 国家社会 / 性别不平等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的后果，特别关注捷克。利用性别研究，我进一步探讨了这种治理性在对于平等和正义的影响。

新自由主义已经成为一种概念快捷方式，解释了当今全球化世界中不平等的原因，包括性别不平等。因此，新自由主义被理解为拥抱利伯维尔场，作为生活各方面的最终决定因素。批判理论试图通过检视其在相互关联领域的机制去避免这种简化。1998 年法国人类学家布迪厄将新自由主义与集体破坏和劳动力联系起来，在削弱个人抵抗全球资本力量的能力。近二十年来，英国文化理论家 Angela McRobbie 一直关注的是将一个人的生命接近经济赋权的文化象征，例如文学和电影人物 Bridget Jones，以及这些如何影响年轻女性的生活。美国政治理论家 Wendy Brown 关注市场逻辑的影响，社会生活的经济层面，还有民主制度的政治合理性。

> Visegrad 德国家的新自由主义和性别

上述那些学者使用了具体的例子进行讨论，但他们经常被视为新自由主义理论背书，导致有呼声要进行脉络化的研究。Visegrad 国家提供了一个实验机会，观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组织的差别执行后果，和如何促进民主化。特别是在 2000 年以后新自由主义的地缘政治批判性研究数量不断增加，我们看对性别不平等及其转型的分析指出，现代性解放带来了 Zuzana Uhde 所谓的“扭曲的解放”，在这种情况下，某些女性群体的培力因为商品化而牺牲了其他女性，像是照顾工作。扭曲的解放不仅是不完整的，而且是在不了解资本主义的情况下，进一步恶化了不平等。

在捷克，女性议员有 20%；性别工资差距为 22%，这之中若是相同企业的相通职位为 10%；女性占了 98.5% 的请育儿假的父母的比例；单亲家庭 90% 是母亲。自 1989 年以来，女性经济越来越不稳定，处于贫穷的危险中；老年女性更有可能贫穷，经济和社会不平等在该国的特定地区与种族 / 移民身份交织恶化。更重要的是，捷克 Visegrad 国家的性别文化以保守主义和性别歧视为首，扭曲的解放不受到挑战；女性的解放动的出现和努力甚至被归咎于该地区的经济困境。

研究性别研究的专家经证明了性别和新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如何相辅相成。Radka Durdová 和 Hana Hašková 指出，1989 年之后的育儿假政策只是 1989 年之前设计的育儿假政



策的延伸，作为再教育政策的一部分。Libora Oates Indruchová 和 Hana Havelková 聚焦于女性和女性主义运动对共产主义时代的解放政策的贡献，而 Kateřina Lišková 则指出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的医学论述中重新引入关于性的双重标准，如果没有该地区性别研究和女性主义理论，这些贡献就不可能实现。

＞ 性别研究的命运

该地区性别研究的命运可能可以帮助我们对于理解在新自由主义下的民主国家内的性别不平等。该学科的建立与美国和后来的欧盟赞助者提供经费给在地女性主义者有关。2004 年左右，两所主要的捷克大学引入了性别研究，部分原因是新自由主义高等教育改革提供了机会之窗，需要更多的学生人数。然而，同样的政治理性促进了最近不仅在匈牙利而且在捷克所取消性别研究政策，这对在中欧性别研究的能力产生了负面影响。正如 Wendy Brown 所声称的，新自由主义理性最终是规范性的，市场逻辑的规则不是假设，而是以牺牲她人为代价的制度。在一个性别保守的地区，我们是很容易去拒绝任何像是共产主义时代社会工程为不平等而做出的努力，新自由主义政治理性首先与一些女性主义者结盟，包括性别研究。匈牙利的性别研究禁令使用完全相同的政治理性，但重要的是，它将其视为经济（基于对劳动力市场中性别研究毕业生缺乏需求），因此也是非政治性的。这有助于反对可能的社会批评，以及通过反性别运动获得普及的政治目的（[这些是由 Agnieszka Graff 和 Elżbieta Korolczuk 在 2017 年描述](#)）。在捷克，2018 年关闭 Brno 性别研究中心的理由是该中心并不“赚钱”，不能吸引学生。

两个案例之间的平行很惊人，虽然在匈牙利，当纪律被描绘为严格的意识形态而非科学时，政治变得明显，在 Brno 案例，新自由主义政治理性在大学领导层未能解决其决策的道

和新自由主义不合的研究和教育在匈牙利，捷克共和国和欧洲许多其他国家受到攻击。照片：Christopher Dombres / Flickr。

德问题时被制度化。要真正反对性别不平等，那在经济方面，以及在容忍暴力和公众人物和政治家对性骚扰的议题上，我们必须清楚其对新自由主义政治理性的内机制和逻辑。若我们要成功地反对新自由主义，我们就必须承认这些依赖关系，因为它们有可能削弱支持女性主义社会的批评力道，特别是性别不平等的规范逻辑的作用很大。自 1989 年以来的 30 年清楚地表明，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理性注定无法消除不平等，因为实际上那是让不平等恶化。

來信寄給 Blanka Nyklová

<blanka.nyklova@soc.cas.cz>

> 美国的性别不平等

持续与改变

Margaret Abraham, Hofstra University, 美国, ISA前会长 (2014-18), 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本土性(RC05), 迁徙社会学(RC31), 女性、性别、社会(RC32), 和人权与全球正义(TG03)研究委员会



女性游行和其他重要的抗议活动在2017年和2018年爆发，跨领域的团结起来。miawicks9来自Pixabay

美国的2018年11月其中选举选出了创纪录的女性国会议员。这次选举也是历史性的纪录，因为美国选出了两位美国原住民女性，两位穆斯林女性，第一位公开的双性恋，以及最年轻的女性议员。众议院议长再次由女性担任。在2019年2月5日，Stacey Abrams 在一场备受争议的州长竞选中失利，然后成为第一位提出民主党对美国总统国情咨文响应的非裔女性。她谈到了解决种族主义，选民威吓，移民的重要性，并强烈批评川普总统政府的关门，这造成了人们生活的痛苦。

在这些小的胜利，激发人们更加关注性别平等和正义的运动。这些小小的胜利与长期的集体抗争历史相联系，以打破霸权结构，并揭示

社会中存在的许多普遍存在且深深嵌入的压迫和不平等，制度，文化。小步胜利是希望的象征，但还不够。我们必须继续实现社会转型和结构改革。

> 美国的脉络

尽管在国会中有更多的女性，但美国性别不平等仍然严重。

- 尽管媒体关注这议题，但薪资的性别差距仍在持续，白人女性的收入比男性低20%，而非白人女性的收入更低于非白人男性。

- 女性主导的职业，如儿童照顾，餐饮服务，在工资阶上继续处于较低收入。

>>

- 男性构成了美国经济中绝大多数的最高收入者。

- 根据政策研究所对世界银行指标的分析，女性的无偿劳动量是男性的两倍，包括了：儿童照顾，老年人照顾，和家务管理。

- [男性的中位数存款](#) 为 123,000 美元，而 2017 年为女性为 42,000 美元。

- 美国大学女性协会报告称，黑人女性毕业时的债务高于其他任何族群。

- 美国人口普查发现，非白人女性在全国的贫穷率最高。

- 跨性别失业率是美国平均水平的三倍。

- 非裔美国女性的[入狱率](#)是白人女性的两倍，非裔的入狱率是白人的五倍以上。

- 美国有三分之一的女性说她们一生中经历过性[暴力侵害](#)。

> 向前进

2017 年 1 月 21 日，华盛顿有一场女性大游行，数百万人走上美国和全球各地的街头抗议川普当选。这是女性主义运动和许多不同运动和团体多年来努力的延续：#BlackLives-Matter，# SayHerName，# MeToo 等是例子。多年来，这些组织和其他组织已经帮助动员并使“交织性”（由 Kimberlé Crenshaw 发明术语）及其它概念成为主流。女性大游行的规模表明了全球社会的集体力量，这可以对抗政府和社会中父权压迫，以及对女性主义的仇视。

女性大游行和其他的抗议运动可以作为组织和沟通改革的方式。这些抗争在 2017 年和 2018 年爆发，站到了剥削系统的最前线。年轻一代利用技术和多种科技动员和解决关键的全球问题，同时使性别平等和交织性成为工具之一。这些不同的运动聚焦生育自主，性别，暴力，移民，劳工，公民，种族正义，言论自由，环境正义等问题。他们带来希望，不畏挑战。小步累机会成为一大步，所以大多数人集结后就会团结力量大。

研究和运动已经证明了性别不平等和压迫普遍存在。暴力对女性的侵害和性别不平等，是权力不对等以及父权规训的结果。性别暴力是系统性的，深深扎根于父权制，但它的起源和后果也是相互交叉的。父权制结构必须受到

挑战。

改变的一种方式是通过交织方法来消除和解决所有形式的不平等和压迫：种族，经济，文化。这些是父权结构，实践，和历史的一部分。我们必须认清并抵抗那些分裂我们的力量，因为那些迫使弱势群体自相残杀。我们需要新的方法来对抗那些破坏平等和正义的力量，避免整个地球毁灭。

在寻找替代方案时，多元敏锐的社会学观点至关重要。社会学已经提出了关于性别不平等的精辟解释，但还有很多需要我们关注的问题。社会学面临的挑战是认真考虑以下问题：如何激发社会学对平等的想象（包括在我们自己的学科和机构内）？有哪些理论和工具可以减缓不平等？我们如何不被收编，而是让研究贡献给不平等的公共认识？社会学如何消解政治分裂和促进沟通对话？社会学能否与其他学科一起合作，为真正的平等和社会正义提供切实的解决方案？显然，我们还需要更多小步胜利和更多的震撼弹，让不平等消失。■

來信寄給 Margaret Abraham

<Margaret.Abraham@Hofstra.edu>

> 阿拉伯的性別和不平等

Lina Abirafeh, Lebanese American University, 黎巴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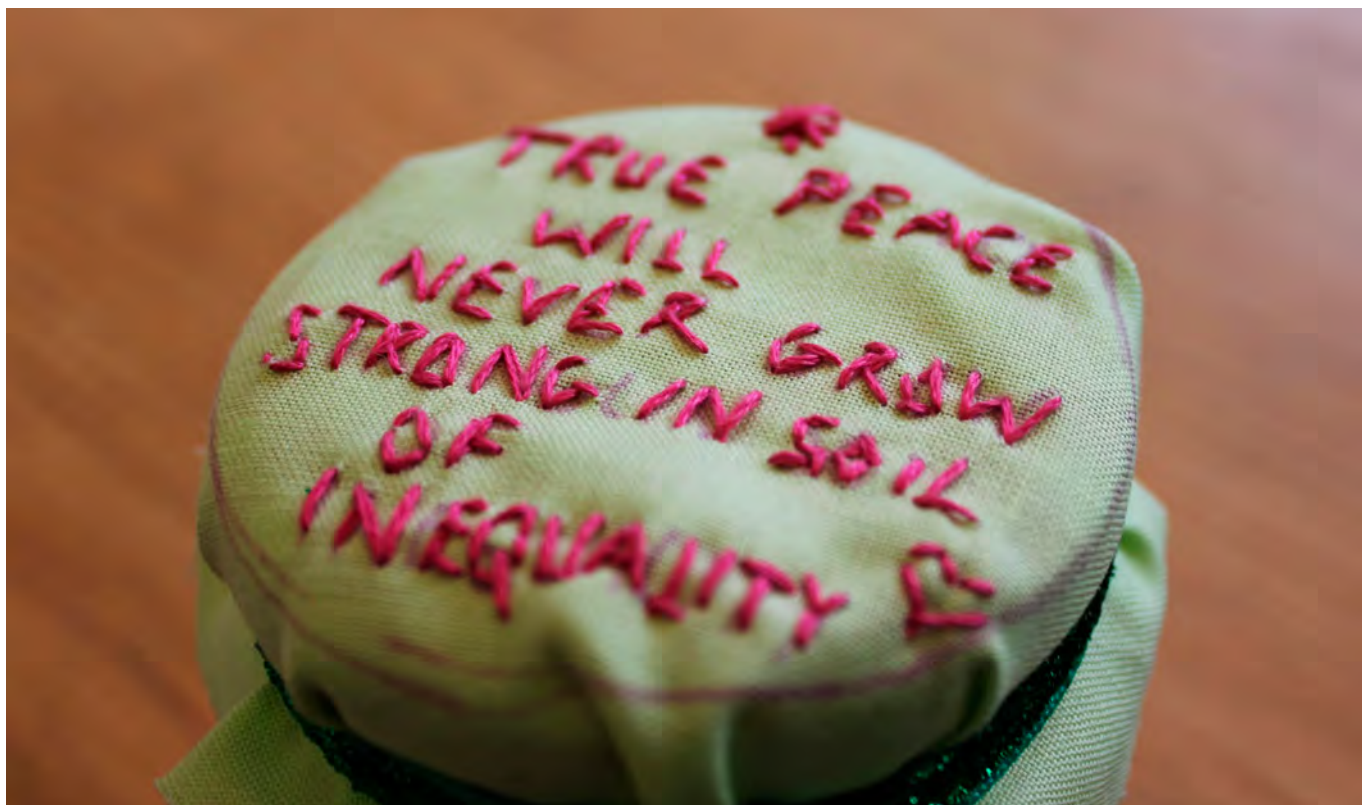


圖: Jasmine Farram.

虽然性别不平等是一个令人遗憾的全球现实，但阿拉伯地区不仅面临着最大的性别差距，而且还面临着改善这种不平等的重大挑战。该地区长期遭受经济和政治上的不安全，加上社会文化障碍和根深蒂固的父权制度。这种组合阻碍了，甚至逆转了性别平等的进步果实。

持续很久了的人道主义危机，像是在叙利亚，巴勒斯坦，也门，和伊拉克，这让情况进一步复杂化。该地区的不稳定正在成为新的常态。这些冲突破坏了社会保护伞，减少安全服务和得到支持的机会，流离失所的小区以及增加的脆弱性也给女性带来了新的不安全感。在冲突时期，性别平等目标很快就会从议程中消失。

2018 年世界经济论坛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提供了对阿拉伯地区性别不平等程度的重要信息。该报告衡量四个方面：经济参与和机会，教育程度，健康和生存，政治培力。目前，全

球性别差距得分为 68%，这意味着，在全球范围内，仍有 32% 的差距可以缩小。中东和北非与性别平等的距离最大：40%。

海湾国家如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科威特，在经济参与和健康方面的差距有缩小，但工资方面仍然存在不平等。卡达增加了女性的政治参与，其议会中的女性比例从 2017 年到 2018 年增加近 10%。

虽说在性别平等方面表现不好，但是沙特阿拉伯缩小了工资不平等差距，增加了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然而，像男性监护权这样的压迫性制度仍然存在，限制了女性的自由和流动性。

尽管黎巴嫩在议会中女性比例的进展很小，但约旦和黎巴嫩没变。由于经济参与率下降，阿曼的性别差距比往年更大。

在世界上表现最差的四个国家中，女性仅占 7% 的管理职位，其中三个在该地区；埃及，沙特阿拉伯，也门。在该地区的 18 个国家中，

>>

有 12 个国家退步。按目前的速度，该地区需要 153 年才能缩小性别不平等差距。

> 性别不平等：黎巴嫩的个案

黎巴嫩是值得注意的案例。2018 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将黎巴嫩列为最差的对待女性国家之一。全球性别平等十个最差的国家包括沙特阿拉伯，伊朗，马里，刚果民主共和国，查得，叙利亚，伊拉克，巴基斯坦，也门，黎巴嫩。2016 年，黎巴嫩在 144 个国家中排名第 135 位。2017 年，该国下降到 144 个国家中的 137 个。在 2018 年，黎巴嫩在 149 个国家中排名 140，落后于大多数邻国阿拉伯国家，包括埃及，突尼斯，摩洛哥，约旦，巴林。

黎巴嫩内乱独断，政治陷入僵局，经济发生困境，使两性平等议程陷入停滞。虽然该国似乎在表面层面培养了一个更加自由和进步的女性环境，但现实远非如此啊。

黎巴嫩批准了主要的国际公约，包括“消除对女性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消除对女性歧视公约”）和 1995 年在北京举行的第四次女性问题世界会议。该国于 1998 年以黎巴嫩女性全国委员会和 2016 年女性事务部的形式建立了全国女性机构。黎巴嫩继续制定（虽然没有经费或执行）国家女性培力战略。尽管取得了这些进展，但该国在性别平等方面仍然落后许多。

一个是女性参与政治生活的程度仍然低的可怕。2017 年 6 月，议会拒绝了黎巴嫩 30% 女性议会保障名额的提议。这对女性权力运动者来说是一个重大挫折。目前议会中只有六名女性拥有 128 个席位。黎巴嫩女性继续以“黑人”的形式参与政治，作为前政治家的寡妇，而不是代表自己。因此，他们继续再生产宗派利益而不是女性的利益，因此，进一步加剧了长期阻碍黎巴嫩的分歧。

尽管女性的识字率和教育程度都很高，但在经济参与和机会方面，性别差距仍然很相当显著。2017 年，女性约占劳动力总数的 25%，这反映出黎巴嫩劳动力中的性别不平等。失业的成年女性比例是男性的两倍。就业政策和法律都无法降低此一趋势，且恶化生活和工作之间的平衡。黎巴嫩女性在经济上缺少权力，被归类到为女性化的职业场域和非正规经济场域，报酬不足，缺乏保护，工作条件不好。此外，女性在高级职位中也大大少于男性，特别是在男性主导的职场更是如此。

该国不同宗教团体的十五项法律阻碍了

黎巴嫩的改革。这些个人身份法规定了女性在婚姻，离婚，继承，养育等方面的命运。这是该国根深蒂固的父权制中最令人震惊的体现。这些守则支持配偶之间的不平等，并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公开歧视女性。因此，女性的身体和生命受到该国宗教法庭的规训。

黎巴嫩的法律制度确实包括对某些形式的基于性别的暴力的保护，但严重缺乏一贯和平等的执法，而且事件继续相对不受惩罚。亲密伴侣暴力是该国最普遍的基于性别的暴力形式。2014 年，黎巴嫩议会通过了“保护女性和家庭成员免遭家庭暴力法”，但这项新法律未将婚内强奸定为犯罪。

2017 年，议会废除了刑法第 522 条，允许检方在与受害人结婚时对强奸犯提出指控。同样在 2017 年，起草了一项法律，将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的性骚扰定为刑事犯罪。可是到目前为止，它仍然是一个草案而已。

尽管多年来的倡导，但还没有法律禁止黎巴嫩的童婚，这个权力在宗教法庭手上。在难民的情况下，这个问题更加严重：叙利亚难民的童婚率增加之中，以应对当前的危机，被迫结婚的女孩无法获得黎巴嫩政府的法律保护。这提醒人们，逃避冲突并不一定能为女性和女孩带来安全。

黎巴嫩的情况反映了整个阿拉伯地区的情况：要实现平等，路还很漫长。该地区必须承诺加速这一变化，否则要等 153 年，谁想等啊？■

來信寄給 Lina Abirafeh <lina.abirafeh@lau.edu>

> 亞洲脈絡下的性別 化勞動與不平等

Nicola Piper, 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 英國, ISA 贫穷、社会福利、社会政策研究委员会(RC19)

亚洲是“南方中的南方”，也是该区域内移民的终点。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估计，2013 年有 1.503 亿移民工，其中男性为 8370 万，女性为 6660 万。联合国指出亚洲移民中女性的比例约为 42.7%，而全球为 48.4%。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亚洲男性移民人数和比例急剧上升，这已经超过了女性移民的增长。

在 1990 年至 2000 年期间，十大双边走廊中只有三条在亚洲境内，但在 2010 年至 2017 年期间，这一数字已增加到六个。由于海湾国家的非公民居民比例极高，海湾次区域（被联合国划分为“西亚”）和位于南亚和东南亚的来源国之间的走廊尤其突出：卡塔尔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移民占总人口的比例最高，分别为 90% 和 88%，其中许多来自非洲大陆，而也有越来越多来自非洲。亚洲移民的其他主要亚洲目的地是东南亚（新加坡，马来西亚）和东亚（韩国，台湾，日本）的经济高绩效的国家。移民的主要来源国是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和越南。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世界经历了大规模、持续的人口流动，亚洲的移民模式和特征成为学者和运动者关注的焦点。亚洲内部移民的一个独特特征是其主导政策框架，该框架以严格临时雇主关系许可的形式出现，为移民提供在国外工作两到四年的机会，但要续签。大多数低技术、低收入工人无法利用家庭团聚和永久定居的签证。临时合约移民是“单一工人”现象的缩影，男性移民通常满足生产部门（如建筑业）工人的需求，女性移民则是与照顾和生育有关的部门，特别是在国内，虽然他们也可以在制造业和其他类型的工作中找到。

亚洲地区的家庭和照顾部门显然由女性移民主导。在西亚，家庭工作还包括园丁，司机，保安，厨师，男性移民往往也在这个部门就业：阿拉伯地区 10% 的家庭工人都是男性。根据国

际劳工组织的统计，据报导，至少有 5360 万 15 岁以上的男女从事家务劳动是他们的主要工作，一些消息来源表明这一数字高达 1 亿。家庭工人就业占后工业国家总就业人数的至少 2.5%，占发展中国家总就业人数的 4% 至 10%。在性别方面，女性占绝大多数的国内劳动力（占 83%），占全球女性就业人数的 7.5%。大多数女性家庭佣工经常旅行很远去从事不充分管制，甚至不受管制，不安全，和低薪的工作，同时留下自己的家庭于国内。

在全球移民研究和政策中广泛使用的诸如“照顾链”等概念借鉴了来自亚洲国家的移民的经验。移徙女性满足较发达经济体对照顾工作者的需求，导致移徙女性本国的照顾短缺。以移民家庭劳动形式在全球照顾链基础上进行照顾的商品化具有远远超出宏观经济预测的深远的社会经济影响，但是留下的家庭的社会和心理影响不容忽视。

事实上，大多数亚洲内部的低工资劳动力都会对关于移民与发展之间联系的辩论产生影响。近年来对移民的许多积极转变是基于技能增益或“脑循环”的假设，是说输出国将从中受益。但这点忽略了大多数临时劳务移民，尤其是移民女性实际从事的工作。在整个南亚和东南亚，大量“低技术”工人在高度受限的情况下进入外国就业。这通常属于短期合约，作为 kafala 系统的一部分 - 雇佣关系的签证计划在海湾地区广泛被使用，或是通过私人招聘经纪人或代理人处理迁移过程的两端。批判性研究发现，这种照顾工作的商品化不会导致任何“人力资本”的获得，也不会影响工资和生活水平。甚至没有采购“技能”，更不用说开发了。生殖工作的隐蔽性模糊掉了这些由此产生的照顾缺陷的发展影响。这对派遣国有影响：移民家庭工人的外流已经满足了它所产生的大量汇款流入的热情，但没有充分考虑它所造成的广泛的医疗赤字所带来的社会经济

“政府政策框架主要涉及迁徙的控制(即个人的退出和进入劳动力市场)和从外国工人那里获取经济利益，不关心移民的人权。”

负面影响。仅以汇款为重点的主流官方论述和政策框架有助于移民的经济面向，并忽视了社会代价。

來信寄給 Nicola Piper <n.piper@qmul.ac.uk>

这种发展模式忽视了女性移民的个人经历和移民所涉及的成本，从而无法关注她们的权利，保护，和主体性。政府政策框架主要涉及迁徙的控制（即个人的退出和进入劳动力市场）和从外国工人那里获取经济利益，不关心移民的人权。

总而言之，亚洲各州一般不制定促进女性跨境劳动迁徙的性别敏锐移民政策。相反的是，一些国家通常以保护为说帖对女性的劳动移民施加法律限制。然而，大多数送出国的劳动法律很难保护女性移民的权利，所以她们受到交叉的结构因素和基于性别，阶级，年龄，种族和国籍的歧视的影响。这些因素进一步加剧了他们面临的挑战。

因此，工资较低的女性化部门（如家务劳动或服装制造业）的女性移民无法获得与其他部门工人相同的劳动权利和社会保护。结构性不平等，原籍国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歧视，和限制性移民控制相结合，使女性通常迁移的途径较少，并且更有可能转向招聘人员（那些帮助移民的个人和组织）。在没有工会代表的情况下，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通过低技术临时工计划或无证工作管道转移到经常不受管制的部门工作。高度的社会经济不安全感，地理隔离，以及对女性临时移民工人的政治权利的剥夺，是亚洲性别不平等的核心所在。■

>IPSP: 性别观的社会进步

Jeff Hearn, Hanken School of Economics, 芬兰, Örebro University, 瑞典, University of Huddersfield, 英国, ISA女性、性别、社会研究委员会 (RC32)



近300名研究人员参与了IPSP。图片来源：Sofie Wolthers（2015）。

35

国际社会进步小组 (IPSP, <https://www.ipsp.org/>) 是在 2012 年和 2013 年初成立成为一个大型独立的非政府社会科学组织, 与政府间气候变迁专门委员会在某些方面雷同 (IPCC)。这个点子在 2013 年 5 月的“Think Global”会议上被讨论 (<https://penserglobal.hypotheses.org/35>), 然后于 2014 年夏季正式启动, 不久之后召开指导委员会和科学理事会的第一次会议。整个过程的关键领导者是 Marc Fleurbaey (普林斯顿大学) 和 Olivier Bouin (RFIEA), 并且得到了许多著名社会科学家的支持, 如 Amartya Sen, Helga Nowotny, Ravi Kanbur 和 Elisa Reis。

该组织的目标是: 全面关照社会进步的各场域, 让最新的社会科学知识更容易取得和更有社会关联性, 向社会行动者和公民, 政府等, 提供未来可能性的想法, 影响公众辩论, 然后

增加学者对社会公正和长期前瞻性思维的兴趣。

我在 2015 年 4 月收到了 2015 年 8 月在伊斯坦堡举行的第一次大型代表大会的邀请, 来自世界各地的 200 名社会科学家共襄盛举, 其中一个“多元化家庭, 性别, 性别。”事实上, “多元化家庭, 性别, 性别”被重新命名为“家庭多元化”, 性别被“纳入主流”。这意味着一些人在该小组中重新调整拓, 最终我在“社会进步的多元方向: 前进”, 以及努力创见了一个关于性别的跨领域小组 (我马上会谈更多这个)。2017 年 1 月在里斯本举行了第二次大型会议。

在已发布的 IPSP 文本中, 总共有 282 位作者, 包括撰稿人。后来因为各种委员会和科学委员会成员的总数增加, 来到到 350 人左右。最初, 政治科学家约占作者的四分之一, 社会

>>

学家和经济学家各自不到五分之一，其余的是其他社会科学，其中一些来自人文科学。大多数来自欧洲和北美，其中大部分来自全球，约60%为男性。

IPSP 的主要原则包括：由下而上的合作，大学和其他机构的非约束性支持和资助，独立于政府和游说者，高度重视多学科方法和利益相关者的回馈。鼓励作者以谦逊和尊重的方式处理分歧，承认专业知识的局限性。IPSP 旨在有条件地规定：“如果你的目标是这样，那么最好的方式就是那样。”社会进步的关键要素是：平等的尊严，基本权利，民主，法治，多元化，福祉，自由，非异化，团结，尊重和承认，文化产品，环境价值，分配正义，透明度，课责性。

这项工作的成果是三大册：“重新思考 21 世纪社会：国际社会进步小组的报告”，以及单卷，“社会进步宣言：创造更美好社会的理念”，剑桥大学出版社。IPSP 作者也参与许多论坛，例如：T20（G20 的国际智库网络，2017 年在德国会，2018 年在阿根廷举行），对话，期刊和纪录片：https://www.illustram.com/a_new_society/。

关于一系列问题的想法可以从三册中看出：第 1 卷：社会经济转型：社会趋势和新地理；社会进步：指南针；经济不平等；经济增长，人类发展，福利；城市；市场，金融，公司；工作的未来；社会公正，福祉，经济组织；第 2 卷。政治监管，治理和社会变革：民主与法治的悖论；暴力，战争，和平，安全；国际组织，治理技术；治理资本，劳工和自然；媒体与传播；第 3 卷。价值观，规范，文化的转变：文化变革；宗教；家庭多元化；全球卫生；教育；归属；社会进步的多重方向；社会科学对政策和制度变迁的贡献。每个主题都研究了当前的情况，历史和未来的趋势，以及受社会正义启发的变革方向，以及这种变化的因素和阻碍。跨领域的主题是：科学，技术和创新；全球化；社会运动；健康；如上所述，性别。跨领域性别小组对章节草案进行了评论，并制作了一份清单，为章节作者提供有关解决性别问题的建议，包括以下要点：

- 性别关系，性别权力关系和性别化过程，不仅仅是性别作为名词，变量或特定的性别类别；
- 性别建构和女性和女性，男性和男性气质的性别差异；

- 将性别诠释为“女性和男性”可能会淡化性别多样性，进一步性别和 LGBTIQ + 连结；
- 性别关系在不同社会中和不同社会中的组织方式截然不同，因为性别制度的可能存在缺陷；
- 儿童，“女孩”和“男孩”不要忽视；
- 区分“性别平等”和“性别平权”的一致性；
- 性别过程和性别制度，可以表示为“性别中立”或“非性别化”的场域，例如：国际关系或交通；
- 性气质，包括非规范性气质，非再生产异性恋；
- 性别和性气质的未来，例如新技术的含义；
- 性别在各个层面上从身份到全球社会关系的交叉构建

总体而言，IPSP 报告旨在收集有关结构性社会变革可能性的最新知识，并综合有关改善社会制度的原则，可能性和方法的知识。例如，仅从倒数第二章就提出了许多建议：克服可持续社会进步的障碍；扩大非资本主义形式的市场活动以及国家或小区在满足人类需求方面的作用；建立充满活力的合作市场；资本主义企业转变为合作社；大型资本主义公司民主化；无条件基本收入；普遍关怀服务；命名和改变机构和政策中的强权和特权；建立跨国组织以促进全球南方的政策制定；将平等议程扩展为“无标记”和跨国政策领域；使民主民主化；以及参与式预算编制。■

來信寄給 Jeff Hearn <hearn@hanken.fi>

> 贫穷和不平等

南非作为非洲的警讯

Jeremy Seekings, 开普敦大学, 南非, ISA 贫穷与社会福利研究委员会(RC19), 前都市与发展研究委员会会长(RC21)



南非在过去的25年里，失业人口暴增一倍。

南非的贫穷和不平等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南非的绝对贫穷率使用标准化的货币收入衡量标准，这数字长期以来一直是相当高的。当然，这代表南非人的收入分配非常不平等。高收入贫穷和不平等根植于南非在种族隔离之前和之下的种族剥夺和歧视的历史之中。然而，经过25年的民主选举政府，收入贫穷仍然居高不下，不平等现象可能已经恶化。显然，民主不一定会减少收入贫穷或不平等。

> 南非持续存在的贫穷和不平等现象

贫穷和不平等的持续反映了各种因素：在2005年

“南非的阶级，种族和不平等”（耶鲁大学出版社）中，Nicoli Nattrass 和我认为，不平等在种族隔离废除之后还是存在，因为它不再受到明确的种族歧视的驱使。在种族隔离制度下，南非白人不仅积累了财产和金融资本，还积累了人力资本（通过种族歧视的公共教育）和社会资本。（我们还要加上文化资本。）这意味着可以废除种族歧视而同时不破坏大多数南非白人的特权行使。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在1994年之后摧毁了明显种族歧视，并采取了相当大的积极肯任政策，支持黑人。但大多数白人继续享有阶级特权。相反，虽然一些黑人受益于种族限制的取消（积极肯任政策）

并且过得很好，但许多黑人南非人继续遭受缺乏任何形式的资本的困扰。没有一技之长，社会资本，土地，十分之四的成年人是失业的。

在我们2015年出版的“南非的政策，政治和贫穷”（Palgrave Macmillan）一书中，Nattrass 和我讨论了为什么在向民主转型后，政治上没有对扶贫政策给予更强有力的支持。我们承认一些政府政策是有利于穷人的。南非的社会援助计划从富裕的纳税人向大多数贫穷家庭重新分配了非常大一部分的GDP(3%至4%)。这确实减少了贫穷，但没有减少不平等。尽管如此，贫穷和不平等仍然存在。这主要是由于高失业率。失业率不

仅仅很高，而且失业人口的绝对数量还翻了一番。除非通过税收资助的社会援助进行再分配，否则经济增长的好处很少会流向穷人。我们认为，这部分反映了劳动力市场政策对劳动密集型部门的抑制作用。

＞越来越普遍的非洲现象

南非的历史通常被认为是一个例外。但是，南非持续存在的贫穷和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现象预示着非洲日益普遍的现象。1990年至2015年期间，全球人口在极端收入贫穷中的比例下降了三分之二，从47%降至14%。估计生活在极端收入贫穷中的人口总数从1990年的不到20亿人减少到2015年的8.36亿人。然而，在非洲，整体贫穷率从57%略微下降到接近40%，而非洲极端贫穷人口的绝对数量实际上升了。与南非一样，尽管经济增长，但贫穷仍然存在。增长带来的好处太少，无法向穷人发展。非洲1990年至2015年的贫穷增长弹性仅为-0.7，而其他地区为-2，这意味着非洲每1%的经济增长减少贫穷仅0.7%，而其他地方同样的增长使贫穷减少2%。非洲的经济增长加剧了不平等，而不是减少贫穷。

非洲与南非不同的是迄今为止，贫困人口主要是农村地区的农民。许多（但不是所有）地区的农民生产力低下，易受干旱的影响。政府则经常忽视农村人口。对农民的“发展”很少带来帮助。非洲大部分曾经以土地丰富和劳动力短缺为特征。现在，它越来越多地以短少的土地和劳动力过剩为特征。提高农民的生产力显然是改善国家粮食安全和减少农村贫困的必要条件。但是，吸收不断增长的劳动力是不太可能的。结果已经很明显告诉我们：年轻人的失业率上升，

其中许多人迁移到城市地区，然后被政治精英视为构成政治威胁。

＞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需要

在南非以及越来越多的非洲其他国家，减少贫穷需要扩大劳动密集型的非农业部门。几乎所有持续经济增长和减贫的历史性案例都涉及劳动密集型制造阶段。在我们的新书“包容二元论：南部非洲的劳动密集型发展，有尊严劳动和剩余劳动力”（牛津大学出版社，2019年）中，Nicoli Nattrass和我使用了W. Arthur Lewis的经典著作，他是非洲的唯一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其研究服装制造业在扩大就业和减贫方面的作用。服装业本身就很重，作为穷人的潜在主要就业来源。孟加拉国的400万件服装生产可能是低工资的，但他们在减贫方面发挥了重要功能，因为农村女性转向生产率更高，收入更高的就业。同样，如果一个劳动力过剩的国家没有越来越多的服装业，那么政策环境就会出现问。

“包容性二元论”一书还包括对南非经验的详细讨论，其中服装制造业的就业率在失业率上升的同时下降。最令人惊讶的是，南非制造业增长的就业弹性可能是负的，这意味着制造业产出的增加恰逢该部门就业率下降。随着雇主投入更多资本和技能密集型技术，劳动生产率已经提高，但就业率却下降了。我们将此归因于我们所谓的“有尊严劳动基本教义”，即追求“有尊严劳动”而不考虑（非）就业的后果。在南非和其他非洲国家提供服装制造业蓬勃发展的环境，贫困和不平等将继续存在。

非洲贫困数据来自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报告（纽约：联

合 国，2015 年），Kathleen Beegle 的“非洲崛起中的贫困”（DG 世界银行，2016 年），和 Zarobabel Bicaba 等人的“消除非洲的极端贫困：趋势，政策和国际组织的作用”，论文 223 号（Abidjan：非洲开发银行，2015 年）。■

來信寄給 Jeremy Seekings

<jeremy.seekings@uct.ac.za>

> 南非的五旬节运动和基督教

Mokong S. Mapadimeng, Human Sciences Research Council, 南非, ISA 艺术社会学(RC37)和劳工运动研究委员会(RC44)



五旬节教牧师喷洒杀虫剂驱魔。

1994年南非的民主选举标志着种族隔离秩序正式崩溃，以及民主黑人多数统治时代来临。这些变化伴随着其他几个变化，尤其是旧制度和结构。其中包括通过五旬节教会和具有卡里司马的基督教教会，其带来了基督教宗教的高潮。虽然这些教会对于南非来说并不新鲜，在二十世纪初就存在，但在1994年后的这个时期，它们在全国各地以指数方式增长，很值得玩味。

然而，教会的指数增长的结果并非没有问题和无争议的。最近我们看到了无数争议性的报导，其中指出这些教会被认为违背真正基督教信仰。在这些实践中，人们用蛇，草，汽油和杀虫剂喂养，作为精神治疗和与恶魔战斗的一部分（见图1和图2）。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一个正在进行的法庭案件针对尼日出生的牧师，其来自耶稣自治国际

(JDI) 教会的 Timothy Omotos 牧师，被控指控性侵，人口贩卖，敲诈勒索，以及另外的例子是马拉威出生的千万富翁开明的基督徒急会 (ECG) 教会的牧师 Shepherd Bushiri 和他的妻子，被指控欺诈和洗钱。最近还有牧师 Alph Lukau 的视频剪辑传送，他宣称刚刚设法让一名躺在棺材里的死人复活。

关于这些教会的争议包括了其私营企业一样运作，可是由于缺乏监管，无法纳税，这促使南非政府任命调查委员会调查这些争议和涉嫌非法业务。这项任务分配给了“促进和保护文化，宗教和语言权利委员会”（CRL 权利委员会）。调查旨在解决被认为对人们的情绪和精神造成伤害的欺诈的问题。有观点认为，尽管教会领导人生活在节俭刻苦之中，但其中一些教会却是为了商业利益而建立的。

五旬节教会和卡里司马教会的日益普遍现象却没有一个社会学的解释，这很令人惊讶。我们或许可以归因于在南非的宗教社会学仍然很不发达。因此，与这些教会相关的一系列社会学问题都没有答案，其中包括：如何解释这些教会的突然迅速增长和指数增长，以及它们在南非人中的受欢迎程度？南非社会的哪些部分积极参与这些教会的会众？谁是这些教会的领导者，是什么让他们如此具有魅力？如何解释会众作为代理人的被动性，以及在这些教会中被视为危险的做法？那些南非宗教组织的监管框架如何，他们是否受到蔑视？

作为提供初步社会学解释的尝试，我从宗教角度出发，探讨宗教及其在社会中的作用。这种观点考察了宗教是如何被理解的，即它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影响。在定义层面存在



一些分歧, James A. Beckford 认为宗教是一种社会建构, 它建立在特定的社会政治和历史脉络中, 并为其提供信息, 赋予其多样化和动态的流动定义。这种观点有助于理解 1994 年后南非五旬节教会和卡里司马教会的指数增长现象。这是一个政治时刻, 承诺“让所有人过上更好的生活”, 但是这是一个从未完全实现的理想。尽管通过向穷人大规模提供基本服务, 改善生活, 但情况仍然。南非的年度经济增长率一直很低, 目前仅为 2.2%, 未能创造大量就业(官方失业率超过 27%)。贫穷和不平等现象正在恶化, 该国的基尼系数为 0.63, 是世界上最高的。道德堕落和猖獗的腐败加剧了这种情况, 其特点是政治精英们为了自我致富而掠夺公共经费。在撰写本文时, 有两个调查委员会正在调查涉嫌腐败的公司利益, 腐败和欺诈行为的指控。

这个脉络解释了南非卡里司马教会的指数增长和普及化。这些教会承诺他们的追随者将以神奇的方式祝福他们摆脱贫穷, 健康不良, 和失业, 以及变得富裕。为此, 他们鼓励会众进行捐献, 最终让牧师变有钱。Beckford 认为宗教是一种非同质的, 复杂的, 多

样化的社会结构, 这取决于它所利用的目的。五旬节教派的独特元素, 包括神奇的医治, 已经被牧师自我致富的目的所利用, 他们扮演先知行神迹。而对于 Steve Bruce 来说, 宗教的影响力很大, 因为人们认为, 在世界上做上帝的旨意所带来的回报将通过永恒的幸福和比平凡的世界所能提供的更大的财富, 现在的五旬节派运动和卡里司马教会在南非都很强调物质回馈。

如果不去看基督教传教教会和西方教育制度根植的殖民主义的历史影响, 我们很难得出结论。具体来说, 基督教会的传教角色是将非洲人从以 Badimo 或 Amadllozi(祖先)为中心的前殖民信仰转变为进入 Modimo / Unkulunkulu(上帝)的精神媒介。这导致非洲人皈依 Badimo 或 Amadllozi 作为恶魔, 这代表殖民化的成功是通过依赖殖民理论概念和类别的教育系统去进行巩固。这证明了 Bruce 的观点, 即宗教可以通过以上帝的名义或共同的宇宙论将人们联系在一起促进团结, 或者改变和破坏先前存在的秩序。■

來信寄給 Mokong S. Mapadimeng
<mmapadimeng@gmail.com>

> 空间入侵者 :

地底女性矿工

Asanda Benya, 开普敦大学, 南非



地底女性矿工
圖: Asanda Benya.

女性加入南非地下矿产劳动力已经有十五年了。目前,矿业中有近 50,000 名女性,约占永久性采矿员工的 10.9%。尽管接近 11% 的采矿劳动力是女性,并且已经采用立法促进和加速其性别包容性,但该行业仍然是“男性化”的,并且被描绘适合于男性身体。在矿职业的论述和文化中,男性身体对地下矿山工作的适应性几乎是本质的。

尽管立法试图解决过去的排斥问题,但采矿中男性身体的自然本质化无意中促成了对女性的排斥。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所说的那样,南非矿业中的女性被“排除在外”。事实上,他们被视为使用 Nirmal

Puwar 的话作为“空间入侵者”,因此产生了“迷失方向的本体焦虑”。他们不仅被指责对生产力和安全有负面影响,而且还因为不符合关于主流女性阴柔气质的社会规范而在矿井内外受到侮辱,背德。

虽然理论上女性可以从事任何工作,但事实上她们被禁止从事某些工作。在我研究中发现,女性不能成为凿岩机操作员,或绞车司机。我工作的少数绞车司机几乎没有把绞车开到地下的。她们利用保护主义论述,策略性地拒绝招募、培训、和分配女性到矿业的某些职业。尽管保护她们免受“艰苦的地下工作”的影响,这也使她们在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因为它们无法获得与男

性相同的薪水。

下文我说的是地底下的许多事件中的一个案例,说明如何用文化和保护主义论中去排除女性就业,每天都有许多修辞性地鼓吹包容的实践去巩固这样的排除机制。

在我的研究的早期阶段,我虽然仍在训练成为绞车司机,但我被告知女性不允许参加钻井课程,原因是基于女性身体,训练官和矿井被认为是不适合女性的,并且女性“太脆弱”了钻,无法操作钻井机。教练们认为钻孔机会对女性的子宫产生负面影响。我坚持并最终被允许加入钻井课程,但我被严格警告只能观察而不能触摸任何东西,因为“热的采石和钻孔”是针对男

>>

性的，与女性身体的解剖学不相容。

在培训中心进行了几天的观察后，其他所有新员工都有机会试用这些机器，并被鼓励尽可能地模仿教练和有经验的工人，模仿他们如何坐着，大腿紧紧地靠在机器上，还有呼吸和身体的节奏。然而，当轮到这时，课程就不同了。导师从最初拒绝让我操作机器，并告诉我女性不能跨越机器。然而，要让机器保持稳定，就必须脚跨越机器。然而，我的教练告诉我要把我的腿放在一起。他说我的“腿必须都在同一边，就像一位女士。”尽管多次看到他帮男工人推一把，告诉他们张开双腿，跨坐机器，感觉它们在大腿之间“握住”它，紧紧地把它推进去。

“他告诉我把我的腿放在一起然后将它们移到一边”否则你将无法生孩子……你正在伤害你的卵子。“工人们还说，一个女人跨坐一台机器看起来“不雅”。

正如预期的那样，当我按照他们的指示并“像一位女士”合并双腿时，机器拖着我不听使唤。当我把它关掉以告诉他们不可能那样钻孔时，在我转过头去之前，教练说“你看我就告诉你吧，女人不能钻，我挖矿很久了，我知道我

在说什么啊。女人就是不能挖矿啊，这是不可能的……这台机器很重啦“(所有工人都点头同意)(田野笔记，Rustenburg, 2012年4月)。对于这些男人来说，我被机器拖着是对女性身体钻孔“不适合”的证实，而不是他们对跨坐机器的“特殊”指示。

这些关于女性身体的先入为主的思想观念不仅仅是在培训课程里，而是渗透到地下的日常工作中。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所记载的那样，在很多情况下，女性被禁止在地下工作，或者只能成为团队清洁和取水的助手，特别是如果工作团队在热门矿场。这，我称之为非正式的工作重新分配，导致女性与团队的隔离，和对工作的疏远，并且短期（不符合工作奖金）和升迁的长期负面影响。

这些不是单独事件，而是系统性的，并强化了采矿业女性的边缘地位，尽管已经立法纳入女性的地下工作，情况依然。我使用上面的例子来说明男女在工作中受过训练和对待，如何非常真实但隐微的及对女性身体生产规训和排斥，从而使他们成为“二等”“地下工人”。很明显地，仅靠立法是不够的，而是要挑战与改变根深蒂固的男性职业文化和

规范。■

來信寄給 Asanda Benya

<asanda.benya@uct.ac.za>

> 失业的严重经济影响

Thabang Sefalafala, 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 南非

学者、分析者、政策制定者、和公众对失业的讨论往往聚焦失业的经济影响，而忽略了在这个过程中也很重要的经济因素。我们经常听到的是失业主要被连结到生活的困难和贫穷的问题。男人无法满足家庭的物质需求，于是被视为对男性气质的羞辱，以及羞耻的根本来源。

关于失业问题的争论，尤其是政策界以及其他方面的失业问题，通常关注失业的经济影响，因此将失业的概念理解为主要是生计问题。

我在 2013 年至 2014 年间对从南非自由州的金矿区被解雇的黑人矿工进行了人类学研究。结果提供了证据去证实了上述这一观点，但也对此提出了挑战。也就是说，这些失业者不会忽视失业的经济影响，但他们也表明他们的因为失业受到了许多其他的损失和痛楚。

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资本主义有力地将工资作为人格和男性气质的定锚点。农村地区有大量非洲男子被招募，并从事工资劳动。无产阶级化意味着共享无产阶级身份的体现，其中工资劳动意味着有尊严的生活，特别是作为男性养家者。

由于工资劳动对于尊严生活的表现具有权威意义，因此出现了南非和全球工资劳动的危机。失业率上升导致越来越多的求职者无法找到工作。此外，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时期的工作往往缺乏与传统工作相

关的特征。他们往往缺乏发声权，安全，和福利。尽管工资劳动存在严重危机，其履行传统职责的能力已经耗尽，但工资劳动仍然是现代世界中有尊严的人之观念的核心。

结果，大多数人们的日常生活经历了深刻、持续的经济不稳定和不安全感。在南非，其被一些人称赞为非洲大陆最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却并未涵盖失业者。因此，失业青年和其他类别的劳动力缺乏稳定和可预测收入去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

我的研究发现，被解雇的矿工其经济不安全的经历往往受到与矿工相关的男子气概自我形成的影响，包括作为养家糊口的一家之主。例如，名叫 Raseboko 的受访者表示，失业会侵蚀一个男人的身份，因为他无法再为他的家人提供服务。他说：“失业已经剥夺了我作为一个男人的地位。一个男人从他的家庭中获得自己的地位。如果我不能为我的家人提供资源，那我还有什么地位？”

失业的男人失去信心，感到毫无价值，甚至可能会因为与失业有关的突然变化和适应不良而考虑自杀：“你不能像男人一样为你的家庭提供资源，压力太大了，我甚至想过要自杀。我觉得我什么都不是，对我的家人来说没什么重要的，很没用。我找不到我活着的理由。“他们看到其他男人为家人提供资源，并且自己无法继续参与小区埋葬仪式和救赎，这让他们感到嫉妒。”

从表面上看，数据似乎支持这样的观点，即失业的不利影响主要与经济困难和贫穷有关。然而，经济困难和贫穷并不仅限于失业者；“工作穷人”受雇但实质上剥夺了人民的利益。

失业者利用缺失部分的黑人受伤尸体的挑衅性象征来描述他们失业的意义。它意味着某种“去分类化”，即与以前一样被置于不同或更低的存在状态的过程。使用病态和受虐黑人身体的图像作为隐喻来描述脱节和破碎的社会和道德秩序。这传达了这样一种观念，即这种存在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存在于世界中的异常。

工资劳动不再作为一种外部活动而出现在工具上，仅仅是为了建设和发展可持续的生计；它成为欲望的具体对象。

工资劳动的体现意味着更深层次，更具存在性的道德权威，使得工资劳动的缺失超越了经济，社会和心理的影响，并有力地表现为失序的无形条件。

失去工作不仅意味着收入的损失，而且意味着道德贬低。也就是说，世界上存在感的丧失是和资本主义关系，规范和价值观相称的。

因此，失业者的羞辱和耻辱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生计受到损害。这还是因为，在以工资为中心的叙事中，失业是一种危机，因为它代表了某种霸权共享和集体秩序的条件。若我们我们把失业的理解基本上是一个生计问题，我们就会认为仅仅管理某种现金转移，

“失去工作不仅意味着收入的损失，而且意味着道德贬低。也就是说，世界上存在感的丧失是和资本主义关系，规范和价值观相称的。”

如基本收入额度 (BIG) 或失业补助金就能解决问题。然而，被解雇的矿工拒绝将现金转移作为对失业的响应。他们拒绝某种现金转移并不是因为他们认为没有任何价值，而是因为他们而言，金钱并没有取代已经失去的东西。

如果工资劳动失败，未来将取决于制定一项策略，使其失去中心并重新构想一个新的共享和集体制度。对替代性工作的思考将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系统地产生了强有力的体现。

前矿工人没有考虑替代方案，他们想要工作。这说明了思考替代方案的挑战。对工资劳动的道德承诺使失业者，政策制定者，和分析家被蒙蔽了

工资以外的可能未来。

对于可行的后工作替代方案，更广泛地说，就是要工人，政策制定者，和社会将一定要去想象一个工资劳动不再是尊严这个核心概念的世界。



來信寄給 Thabang Sefalafala
<Thabang.sefalafala@gmail.com>

> 怎么喂养世界？

坦尚尼亚的启示

Marc C.A. Wegerif, University of Pretoria, 南非



Dar es Salaam的传统市场。图: Marc C.A. Wegerif.

搬到坦尚尼亚的 Dar es Salaam，我对几乎每条街上卖食品和家居用品的小商店 (duka) 着了迷。我同样对传统市场着迷，因为那是充满活力的社交空间，有许多小摊贩，他们彼此认识，并且多是熟客光临，住在我居住的地方的步行距离之内。因为这样，我研究了 Dar es Salaam 的 500 万居民的日常生活。这为我们不断成长的都市化世界人口提供了重要的

经验。

> 跟着鸡蛋走

早些时候，我在我当地的小商店上跟着被卖出的鸡蛋去探寻背后的路径，这些鸡蛋通常是放在纸板托盘中出售。为了看看他们来自哪里，我和 Samuel 一起骑车送蛋。经过 22 公里后，我们到达 Samuel 的城郊住宅，坐在树下与家人吃午餐。Samuel 饲养 100 只鸡，并从附近的养鸡户那里购

>>



Samuel 把蛋送到Dar es Salaam的小店。
图: Marc C.A. Wegerif.

买鸡蛋。他在晚上会买了 600 到 900 颗鸡蛋，然后骑到城里，第二天早上卖掉。他每周三次进城的利润是全职农业工人最低工资的 2.5 倍。量化分析发现，每周大约有一百万个鸡蛋沿着 Samuel 使用的道路上用自行车运到城里贩卖。这种环保的新鲜鸡蛋分配方式是该市的主要供货商，也是成千上万人为自己创造合理质量生活的方式。

进一步的研究显示了鸡蛋产业如何融入更广泛的食物体系。Samuel 从一家饲料厂购买鸡饲料，这家饲料厂很近，可以用手推车装麻袋带回家。饲料厂从当地的工厂获得玉米麸的核心成分，而 Dar es Salaam 有超过 2,000 种这样的原料。鸡粪被用作园艺用的粪肥，然后用这种肥料种植出来的蔬菜在市场中出售。

我的研究也关照了对城市大多数人来说很重要的其他食物：玉米，大米，牛奶，牛肉和绿色蔬菜。虽然食物的性质不同，地理来源从进到远都有，但食物生产和分配的组织具有相似性。许多绿色蔬菜和牛奶，如鸡蛋，都来自城市和城郊生产，用数百公里以外

的卡车运输过来。大米和玉米由内地数百万农民种植，大多数只有几公顷的土地，用于家庭消费，重新种植，或是出售。贸易商与当地经纪人（通常是农民自己）一起工作，进入偏远的村庄，即使是小批发量也要支付现金，然后将其汇总运输，大部分运往 Dar es Salaam，有时通过区域市场运输。贸易商安排运输，加工和分销到小商店和传统市场等零售店。根据需要，她们从许多不同的运输企业雇用卡车。通过每袋或每公斤支付使费用去进行量玉米碾磨和稻米脱壳。

> “共生食物系统”

这个食物系统提供了城市的大部分食物来源，包括从农民到零售商。除了税收之外，没有公司和国家直接参与，所以我称之为“共生食物系统”，因为其他术语，例如“非正式”，并不妥当。共生并不意味着所有关系都是平等的，可是这个关系是互利的而不是掠夺型的，否则这系统不会永续。参与者在社会镶嵌的经济关系中运作，这种关系涉及竞争和协同工作之间的紧张关系，其争取自治和团结。也

有正式的结构，其中有选举产生的委员会，和适用于共同资源管理原则的规则。然而，更常见的是，协作是在没有明确规定的规则、结构或合约的情况下有机地进行的。大家相互依存，享有相对公平的地位和共同的文化特征，根据已建立的规范和关系一起共事。互惠是这些规范的一部分，但并不局限于狭隘和直接的物质交换而已。协作像是共享运输和信息，摊位元和协助托儿服务，合作克服资源限制，并创建有价值的社交网络。这不是基于目的性团结（虽然团结通过其实践发展）或利他主义，而是基于在特定背景下产生的。在坦尚尼亚，这种背景包括通过关税和其他措施保护农业免受国际竞争，以及限制少数人资本积累的国家干预历史。一种重要的互助形式是从新进入者开始，无论是农民，贸易商还是零售商。人们总是在他人的帮助下开始自己的商业，像是家人，朋友和熟人，若已经在同一个企业中，那这些人可以向他们展示工作的机会和方式，并将他们介绍给关键的参与者。从狭隘的经济角度来看，他们正在帮助创建自己的竞争对手，但他们也在创造未

来的合作者。在另一位交易员向他展示他可以提供的路线和商店之后，Samuel 开始了鸡蛋交易。稻米和玉米贸易商首先与现有贸易商一起前往产区，并向贸易商和农民介绍。店主通常以店员的身份开始，作为一种学徒形式，允许他们学习并省钱以开展自己的事业。这种机制通过复制扩展系统，使其保持公平，并将新进入者纳入既定规范。

坦尚尼亚生产的所有食品和通过共生食品系统分销的食品比小商店和传统市场便宜。此外，这些商店使食品更容易取得，因为它们靠近人，食品需要（或能够负担）的任何数量的销售，或是延迟营业，都可以掌握，好向他们的熟客提供免息贷款。与供应超市或其他商业价值链相比，通过共生食品系统销售的农民也能获得更好的拍卖价格。

＞ 对食品供应系统的影响

自 2014 年以来，三个国际超市集团已经倒闭或退出坦

尚尼亚。一些计划中的大规模农业投资，包括大型土地交易，也已经败退，或远远落后其业绩，包括由南部农业增长走廊支持的孟山都公司，Yara 公司和 Unilever 公司在内的公司，以及 2010 年世界经济论坛上发布的多边机构（如 G8，世界银行，粮食和农业组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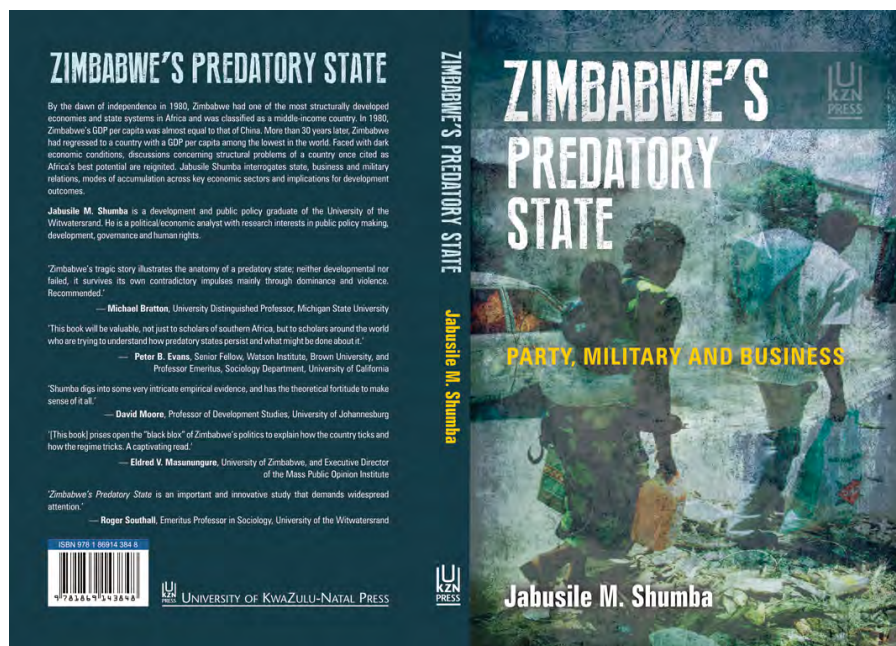
尽管有这些失败，Dar es Salaam 的食品仍在货架上出售。由小农民生产的坦尚尼亚玉米和水稻在过去十五年中大幅增加，与一个规模翻倍的都市并驾齐驱，自 2002 年以来增长了 250 万人。Samuel 将其交付量从每周三个增加到每周五个，提供相同的小商店和一些新的小商店。■

來信寄給 Marc C.A. Wegerif
<marc.wegerif@up.ac.za>

> 津巴布韦的掠夺型国家

政党、军队、商业

Jabusile Madyazvimbishi Shumba, 非洲大学, 津巴布韦



就会赢得历史。然而，权力的解放运动不仅对许多期待者，而且对现在统治的大多数公民来说都是一种失望的象征。津巴布韦在 2000 年独立时是一个非常具有前途的年轻国家，在 2000 年代之后，暴力，灾难性经济失败，贫穷和苦难的形象联系在一起。这边有几个问题要回答：为什么会这样？这是怎么发生的？统治精英是否知道他们的选择会导致津巴布韦的发展下滑吗？

> 掠夺型的国家

在津巴布韦的“掠夺型国家：党，军事和商业”一书中，我认为津巴布韦国家最好被概念化为掠夺型。然而，掠夺型国家的概念仍然难以捉摸。我与其他拥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将其挪用于发展国家模式，看成一种特殊的变体或一种新的主体形式的对立面。实际上，对后殖民时代非洲的大多数政治经济学取径都倾向于强调政府缺乏中央权威。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掠夺型”一词本身就意味着力量，也就是说，它意味着掠夺者捕食目标的能力，国家需要力量使其受害者服从。对于国家来说，这种力量不是缺乏中央权力，而是透过国家能够通过它来行使控制权。

根据我的实证研究，我认为掠夺型国家是一个统治阶级的反发展积累和再生产，并拥

在学术辩论中，津巴布韦的故事与两极分化有争议。该国家的本质存在这样的疑问和争议：津巴布韦是脆弱？强大？不合作？或是掠夺型的国家？2017 年 11 月 15 日，当军方介入导致长期统治者总统 Mugabe 政权，有些人将决定性的军事干预看成是典型的“政变”。然而对于其他人来说，基于长期的沮丧并渴望看到总统 Mugabe 的消失，不惜一切代价让其离开，可谓证明了手段的合理性。更有人创造性地将其视为“军事帮助下的过渡时期”。

许多人都同意津巴布韦摆脱了群众和解放斗争。只要解放斗争让白人至上主义在殖民少数民族的失败中结束，我们

有以下特点：(1) 政党和军事宰制；(2) 由宰制和占领所形塑的国家－商业关系；(3) 暴力和庇护所形塑的国家－社会关系。然而，“专制发展国家”与掠夺型国家之间的区别值得进一步澄清。我们要问：如何在国家结构和与社会的關係方面区分这两者，以便理解解释不同发展轨迹的结构变化？

> 掠夺型国家与专制发展型国家

我认为，威权主义发展国家的早期版本和掠夺型国家都具有实质威权倾向和个人网络的强大作用。例如，在韩国高增长的工业化过程中，朴正熙与两个国家领先的企业 Hyundai 和 Daewoo 着密切的政商关系。因此，人们可能会发现很难将国家定义的公共增长目的的作用与私人利益动机和裙带资本主义的作用区分开来。但是，国家总是掌握着这关系，永远有规训能力。例如，当企业未能达到既定目标时，他们会因撤销激励而受到惩罚。国家的强制力量是普遍和真实的。

两者与军方关系的性质也有所不同，因为二十世纪发展型国家军队的使用是面向国家而不是个人积累。例如，在亚洲古典发展国家模式中，军队在控制和压制国内劳动力方面发挥了显著影响力，以保持低生产成本，以获得行业竞争力。总之，掠夺型国家使用军事暴力反映了权力精英的个人

主义及其积累利益的机制。就积累方式而言，我们会看到制造业显然不存在。这指出了掠夺型国家的寻租性质：即，它基于资源榨取而非生产。津巴布韦经济结构的变化，从制造业转向资源型开采的独立后主导地位，与这种掠夺型转变有关。制造业的缺乏会影响生产的不足，这是不同部门的统一特征。事实上，政策的主要目标（如本土化和赋权）是将租金引入给统治精英。最后，国家需要与外国资本（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和南非）的合作，以产生外汇和税收，以支持基本的政府运作。因此，其也允许友好的外国资本参与资源租赁。结论是，不仅是权力精英的阶级利益阻碍了经济转型和发展，其贪婪的资本积累和政治再生产方式还改变和维持了津巴布韦的掠夺型国家特征。这种影响将是深远的。多年来，这个国家的发展能力被一个掠夺精英所削弱，这些精英依靠暴力维持权力和积累财富。改革将带来政治成本，因为它破坏了深深嵌入的侍从网络。在 2017 年 11 月军事干预政治之后，党，军队，和商业三者综合体重新焕发活力，在未来几年将会持续下去。■

來信寄給 Jabusile Madyazvimbishi
Shumba

<jabusile_shumba@biari.brown.edu>

> Joz i : 黄金的危险城市

Alexia Webster, 摄影家, Edward Webster, 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 南非, ISA 劳工运动研究委员会 (RC44)



约翰内斯堡郊区的废弃金矿井，非正式矿工再次使用。照片来自Alexia Webster。

约翰内斯堡作为非洲 125 年的经济中心，被称为 Joz i，意思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但它不是建在河岸边或靠近大港口，而是建立在黄金上的。从一开始，开采黄金创新改变了城市，并受到来自整个地区、甚至全球的移民浪潮的影响。这一点在 Sarah Nuttall 和 Achille Mbembe 撰写的关于约翰内斯堡的文

章中被提及，因为他们将这座城市描绘成一个混杂和即兴的地方，是一个正在发展自己的国际大都会文化品牌的大城。

但约翰内斯堡还有另外显为人知的一面，不仅是人类生活的破坏性一面，也是自然本身的破坏性一面。用 Joseph Schumpeter 的话来

说，约翰内斯堡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案例。一些人认为，在城市郊区废弃的矿井中不受管制的采矿是会摧毁这座黄金之城的。



没有标记和隐藏在公众面前的，是一个临时矿工及其子女的居住地。绝望的无证移民带来了他们的家人，并在离市中心不远的隐蔽空间中勉强维持生计。照片来自Alexia Webst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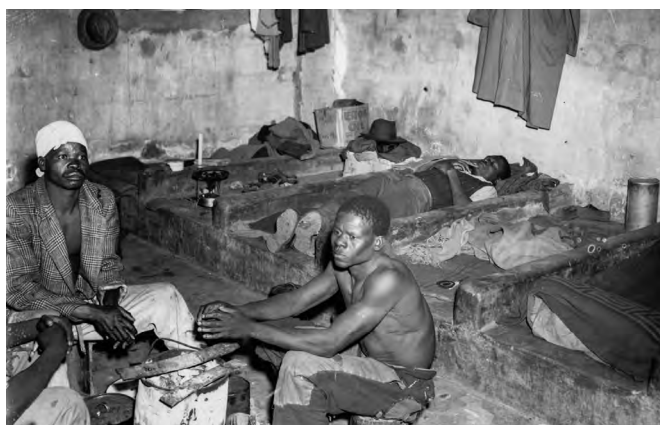
> 矿业的起源

了解 Jozi 黄金开采的根源是敏感的成本结构。早期勘探者面临的挑战不是找到黄金，而是找到相对应的买卖价格。由于这两个原因，利润取决于低生产成本。首先，因为矿石的平均含金量低，并且沉积在地下深处。其次，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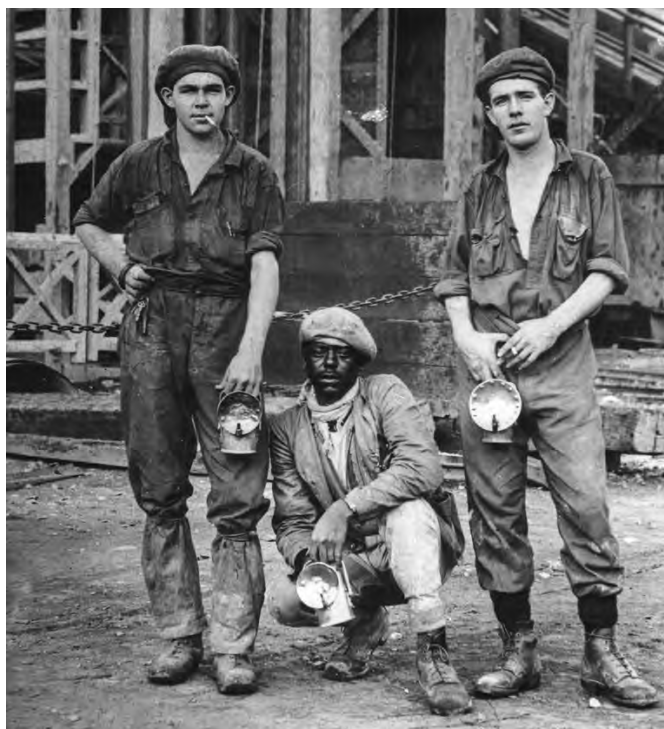
际上规定的黄金价格阻止了采矿公司将工作成本的任何增加转移给消费者。因此，在这种狭隘的成本结构中，成本最小化的方式是压低工资。因此，矿主的任务是找到和管理大量廉价的非洲劳工。



在地下深处，在狭小的顶部空间和不稳定的支撑系统里面，黑人矿工准备爆破。多年以后，他们的工作经历影响了他们的健康，大多数早死于呼吸道疾病。照片：摄影师不详，Luli Callinicos 的档案。



操作混凝土的矿工。一个宿舍可容纳多达40名男性，几乎没有最基本的储藏，照明和供暖设施。照片：UWC- Robben Island博物馆，Mayibuye档案馆。



1907年，两名年轻的白人矿工在一位经验丰富的黑人矿工旁边招募新人。黑人矿工的收入大约是白人矿工的十分之一。照片：摄影师不详，来自Luli Callinicos, Gold and Workers的档案，第75页。



回家。经过长达一年的合约，矿工们回到家中，送家人礼物。照片：Neave 非洲收藏，非洲博物馆档案室。



回家，1933年，一名移民在Mduduma送他的家礼物。照片：SA Review Pictorial，1935-36。

为了维持生产，地雷越来越深入地底。金矿的高事故发生率与黄金开采的特殊深度有关。其开采平均深度超过1600米，最深处达到地下4000多米。事故的主要原因包括岩石爆裂和岩石坠落。1983年是我们开始研究的那一年，有371名矿工被岩石坠落击死。1900年至1985年间，66,000名矿工在地下死亡，超过一百万人受重伤。许多男人因岩石坠落而永久残废，他们的余生都在轮椅或医院中度过。

黄金是一种“奢侈品”。随着时间的推移，约翰内斯堡的黄金数量已经耗尽。该市的人口呈指数增长，其二次经济蓬勃发展，成为该国最大的金融中心。这些地雷停止正式生产，遗址被废弃。

然而今天，离市中心不远的地方，如Janet Munakamwe在她的博士论文中表明，跨境移民试图在采矿业的边缘谋取非法生计。他们被称为zama zamas。他们每天早上都会使用原始设备，在手机上使用绳索和火把。他们用简单的锤子，铲子/铁锹和凿子将岩石打开并收集矿石。



在一个重新开放的废弃矿井中，妇女们背著婴儿磨矿石。照片来自Alexia Webster。



矿工拿打破地下岩石的锤子。照片来自Alexia Webster。



一个“zama zama”，一个大容器将水泥倒入桶中。矿工拿打破地下岩石的锤子。照片来自Alexia Webster。



刷矿石的女性矿工。照片来自Alexia Webster。



边研磨矿石和边编织头发并喂孩子。
照片来自Alexia Webster。

Angela Kariuki写道：“这是一项风险很高的工作。”因为工作数周(有时甚至数月)的情况下，条件很差，缺乏空气和通风设备。他们还报告说，有些人已经窒息，特别是当他们在非常寒冷的地下条件下点火以保持自己的温暖，或软化硬岩区域时。他们谈到胸部感染，持续咳嗽，以及在频繁的岩石坠落，洪水或其他事故中持续的身体伤害，或者因为缺乏脚踝支撑的安全靴导致。面对那些已建立的工会运动的漠不关心，这些矿工开始通过社交媒体支持的社交网络进行自我组织。很少有人属于工会，但新的代表和参与形式正在兴起，例如工人咨询办公室，埋葬社团，和移民权利协会。



劳动时间的最终产品是一小块黄金。
照片来自Alexia Webster。



与过去的正式采矿系统不同，非正式地雷涉及女性和男子及其家人。照片来自Alexia Webster。

但是，当约翰内斯堡市市长 Herman Mashaba 宣布该市面临“迫在眉睫的灾难”时，不受管制的采矿业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星期日泰晤士报”，2018 年 11 月 25 日）。他宣称，非法矿工将这座城市带到了前所未有的灾难的边缘，因为 zama zamas 的操作使得约翰内斯堡的高度易燃气体和燃料管线爆炸。他说，如果其中一条线被损坏，三角范围内的一切都将“被焚烧殆尽”。市议会的一位官员告诉“星期日泰晤士报”，由于这座 140 公里的迷宫，该市的关键部分也

面临崩溃的威胁，因为非法采矿者在城市下挖掘或爆破的新建和现有隧道。因此，在犹太人废弃的金矿中作为“非法矿工”的绝望女性和男子正在努力寻找生计的影响下，建立在黄金矿工背上的城市面临崩溃。虽然有些人可能会庆祝这些勇敢的矿工的“利伯维尔场”和企业家精神，但正如 Karl Polanyi 几十年前所观察到的那样，无管制的市场不可能“存在很长时间而且不会消灭社会的人类和自然”。受环境破坏影响的采矿小区已

形成保护这些不稳定小区的网路。这些举措是否可能成为 Polanyi 设想的反运动的萌芽似乎不太可能，但它支持 Michael Burawoy 和 Karl von Holdt 在与布迪厄的对话中所称的“约翰内斯堡时刻”。他们写道，约翰内斯堡时刻是一个后种族隔离时刻，一个政治破裂的时刻。这也是一个激烈争论，社会分裂和“社会深刻混乱”的时刻。■

来信寄给：

Alexia Webster

<alexiawebster@gmail.com>

Edward Webster

<edward.webster@wits.ac.za>

> 從團結的觀點看 右派民粹主義

Jörg Flecker, 維也納大學, 奧地利, 工作社會學研究委員會(RC30), Carina Altreiter, István Grajczar, Saskja Schindler, 維也納大學, 奧地利



2019年1月在匈牙利布達佩斯反新勞動法的抗爭。圖：Attila Kisbenedek / AFP / Getty Images。

在2008年的金融和經濟危機，以及對公部門的信任度下降之後，歐洲的極右翼政黨開始受益於社會經濟的巨變。自世紀之交以來，這些政黨已將社會問題列入其政治議程。由於移民始終是一個核心問題，所以這些政黨可以在2015年難民議題去動員民眾的怨恨和敵意。因此，他們的福利沙文主義的神主牌是奠基於福利國家和仇外情緒。在這個過程中，極右派已經宣稱團結一致，不給左派有任何餘地。例如，匈牙利總理 Viktor Orbán 將匈牙利邊境關閉給難民，這是一種所謂的歐洲團結的象徵。

“危机时期的团结” (SOCRIS)¹ 研究以团结概念为出发点，然后观看象征斗争于政治中的展开。这里象征斗争指的是（集体）行动者试图将他们对社会世界的看法强加于他人斗争。这种斗争关于我们认为什么事正确或错误的，什么是好的或坏的，什么是有价值的或无价值

的，以及及将人们分成类别，建构“象征性边界”。我们聚焦在奥地利和匈牙利，因为这受经济危机的影响很大，虽然不同，但有着类似的政治发展。通过对量化和质化数据进行方法论三角测量，SOCRIS 提供了我们对社会变革与政治主体性之间复杂关系的更深入的理解。

為了分析團結的概念和相象徵鬥爭，我們考慮了想像的共同體的範圍或邊界的維度。我們在2017年7月至9月在奧地利和匈牙利進行的SOCRIS調查，以工作年齡的代表性樣本為基礎。我們對資料的分析提供了深入的理解，關於誰表達了團結感，何時以及為什麼人們覺得有責任幫助他人，以及他們是否支持福利國家對不同人群的支持。

重要的一個研究問題是：在嚴重分歧的國家中，例如對於難民支持的極化，或是經濟狀況、社會福利、國家對弱勢群體的支持等問題分歧立場，有哪些不同的團結概念？根據他們

>>



| 2019年3月在奧地利維也納的反種族主義示威。圖片：Jörg Flecker。

對團結的看法對人們進行分組，對調查數據進行統計叢集分析，我們得出每個國家可以被分類成七個小組。令人驚訝的是，一些團體在兩個國家都表現出類似的團結概念。例如，“非固定和不活躍”群體的特點是不太支持福利國家，比較願意限制家庭和社區的團結，以及缺乏民間社會組織的活動。在團結連續體的另一極，我們在這兩個國家找到了一個“團結和積極”的群體，即人們表現出一種團結的模式，其特點是對福利國家的強烈支持，和民間社會的高水準活動。然而，這一群體的團結範圍在各國之間有所不同：雖然在奧地利人們對全人類表示關切，但在匈牙利，人們的關注僅限於民族國家範圍類。

但是，絕大多數人口可能位於這兩種極端之間。我們可以確定其他幾個群體顯示出了團結基礎和範圍的不同組合以及活動水平。有些模式只存在於其中一個國家，但最顯著的國家差異與群體的規模有關。如果我們將團結或團結的類型放在一起，只區分排他性和包容性，即人們是否贊成種族和民族主義的封閉或表現出普遍的團結，我們看到 62% 的奧地利人擁有某種形式的包容性團結，而這一點只有 39% 的匈牙利受訪者表示這種情況。相反，大約 40% 的匈牙利人表現出明顯的民族或國家有限的團結，而這適用於奧地利 27% 的受訪者。

由於兩國仇外和福利沙文主義政黨的力量，看看團結模式是否符合政黨的偏好也是有趣的議題。正如所預期般的，極端和民粹主義右翼政黨的強烈支持可以在兩國的非團結和全國獨立的類別中找到。然而，我們還發現，最具包容性的集群（匈牙利 20%，奧地利 15%）的大部分人都是這些政黨的支持者。這意味著有

些人投票支持這些政黨不是因為他們的仇外和福利沙文主義立場，而是因為他們的仇外心理和福利沙文主義立場。它還應該提醒我們不要假設極右翼僅僅代表人口中存在的態度，因為人們可能會因為不同的原因而被吸引。

與當前關於右翼民粹主義的大部分辯論相反的是，SOCRIS 的研究發現，不僅是一個特定的社會群體，如藍領工人，他們的投票行為解釋了極右翼的成功。雖然較低社經地位，貧窮和政治無能為力的確是重要因素，但令人驚訝的是，奧地利和匈牙利極右翼政黨的相當一部分同情者都富裕了起來，並從最近的社會經濟變化中受益。

團結觀點有助於我們理解社會中的分裂和對極右翼的支持。團結概念和政黨偏好之間存在一定的相關性。然而，儘管福利沙文主義很重要，但我們不能僅僅將這些政黨的成功追溯到“排他性的團結”。首先，與他們的言論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政黨甚至不支持福利國家。更重要的是，團結模式往往相當複雜，隨之而來的含糊不清和矛盾為不同方面的政治動員提供了一定的開放性。■

註1：這個研究由奧地利科學基金會FWF (Nr. I 2698-G27) 和匈牙利科機會OTKA (Nr. ANN 120360) 所支持。

來信寄給 Jörg Flecker
<joerg.flecker@univie.ac.at>